SGP

The GEF Small Grants Programme

社区保护地
生态保护的显微荒野

策划 /《中国周刊》编辑部
支持机构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实施的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UNDP GEF SGP）自 1992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支持原住民和社区保护以及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在地行动。目前已经在 125 个国家支持了数以千计的社区保护地。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自 2009 年成立以来，共支持了 21 个社区保护地，其中有 9 个已经在原住民和社会保护地注册系统（ICCA Registry）成功注册。这些社区保护地都处在中国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和生态最脆弱的地区，如云南、广西、贵州、青海、甘肃等。它们有的是自然圣境，有的与政府的保护区重叠却实际上由社区保护和管理，有的在原有的基础上由民间组织扶持推动，有的已经获得政府的备案和挂牌认可。无论是哪一种形式，这些社区保护地都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保护着中国乃至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地区。

UNDP
Empowered lives.
Resilient nations.

gef
www.theGEF.org

The ICCA Consortium

社区保护地
地球上最古老的保护地模式

文 / 刘怡

2014 年 6 月第一次到云南迪庆州的藏族村落巴珠，惊异于村里极高的森林植被覆盖率和清亮透明的巴珠河；清晨是在各种鸟鸣中醒来，据当地调查，巴珠的鸟类有 200 多种。陪同我们访问的当地人呷土指着远处的山峰说：“我们村里有八座神山，上面住着山神，大家只能在神山上祭拜、转经祈福，不能大声喧哗、不能砍柴、扒松毛、更不能砍树，即使是已经倒了的树也只能留在神山上腐烂。每年 6 月到 10 月是雨季，这时候是山神吸取养分的时期，所有的山林都禁止砍树，连人们上山都不准带斧头。”巴珠村的村民就是靠着这种祖祖辈辈传下的老规矩世代守护着这 8 万多亩的森林。因为森林保护得好，水源就涵养得好，即使是在 2010 年云南全省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旱，巴珠也没有缺过水，还成了云南省林业厅表彰的典型。

像巴珠这样，由社区基于传统习俗或习惯法自愿管理的社区保护地遍布全球各种类型的生态系统和文化形态，从喜马拉雅的神山圣湖到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保护地，从印度的神兽 / 神鸟栖息地到伊朗游牧民的迁徙路线，从塞内加尔的牧民保留地到西班牙的社区森林，从津巴布韦的神圣森林到日本冲绳的里海。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ICCA）定义为：“包括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和文化价值，通过习惯法或其它有效途径，由原住民和当地社区自愿保护的自然的或人工改造的生态系统。”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社区保护地具有三个共同的特征：第一、社区保护地涉及到某种类型的“公地”，社区同一个生态系统或周边的自然资源在文化或生计上紧密相连；第二、社区保护地具备有效的制度安排（习惯、规范、当地文化、非成文法），在现存的制度安排下，社区有决策的能力和权力；第三、社区的决策使得社区的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和文化价值得到了有效保护。

世界各地的许多原住民和社区都与他们周遭的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紧密相连，他们与自然的关系远比划出一块土地设立保护区要复杂得多，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他们的生产、生活、传统知识、精神需求、文化习俗都与这些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交织在一起。原住民和社区可能出于多种目的而保护和管理他们的保护地，他们可能为了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清洁的水源，防止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而保护自然；他们也可能为了精神需求或宗教信仰、身份认同而保护，比如藏族的神山圣湖、傣族的龙山、彝族的神树林以及其它民族的风水林等；他们还可能为了抵御外界的影响和威胁、保持自己的政治、文化、经济的自治而保护，比如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度等地的原住民、部落保护地。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的管理目标同政府管理的保护区十分相似，可能是严格保护类的，比如自然圣境类的社区保护地；也可能是为了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而进行保护，比如马拉西亚的社区可持续渔业管理区、蒙古国的部落草场、意大利阿尔卑斯山的社区森林等；还可能是为了修复生态环境而进行保护。较多的情况是，同一个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往往有多个管理目标同时存在，而不仅仅是某个单一的管理目标。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在平衡社会、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是全球无数原住民和社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确保原住民和社区能够获得足够的食物、药品、能源、水、饲料、收入等，同时也是原住民和社区的精神家园，是他们身份认同、文化自豪和集体记忆的基础。很多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保护着关键生态系统和受威胁的物种，并维持基本的生态系统功能，为动物和基因的迁移提供廊道和联接。由于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是基于传统、文化、规则等习惯法来保护的，它确保了社区作为治理的主体，以及社区对他们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权力，是实现社会公平、多元共治的有效途径。

在过去 20 年中，ICCA 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IUCN 按照保护区管理目标的不同，将保护区分类为 :Ia 严格自然保护区，Ib 荒野区，II 国家公园，III 自然纪念物，IV 生境 / 物种管理区，V 陆地 / 海洋保护景观和 VI 资源管理保护区。同时，IUCN 根据谁拥有保护区的决策和管理权以及谁对保护区负责，将保护区分为四种治理类型：A 政府治理（国家或地方政府部门对保护区拥有责任、权力、义务，并决定保护区的管理目标，制定和执行保护区管理计划，同时也拥有保护区的土地、水和其它自然资源。）B 共同治理（多个政府或非政府部门共同承担管理的权力和责任，例如集体管理，决策的权力和责任由一个机构承担，但根据法律或政策的规定，这个机构在决策时必须通知或咨询其他利益相关方。又如联合管理，是由不同的人组成具有决策权力和责任的管理主体。再如跨界保护区，至少涉及两个或多个政府和其它的当地机构作为决策主体。）C 私人治理（包括由个人、合作社、民间组织、公司所控制和拥有的保护区。管理保护区的权力取决于土地所有者，由他来决定保护区的管理目标、制定和执行管理计划、负责决策和遵循相关法律规定。）D 原住民和社区治理（原住民或 / 和社区通过不同形式的习惯法或成文法，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和规则，对保护地行使管理的权力和责任。）可见，ICCA 是跟政府治理的保护区、多个部门或主体联合治理的保护区以及私人设立的保护区平行的一种保护区治理形式，它可以是 IUCN 保护区管理分类的 6 种类型中的任何一种。

2003 年，在南非德班召开的第 5 届世界保护区大会（World Park Conference）上，保护专家们第一次系统化地使用了“保护地治理”的概念，并指出原住民和当地社区是保护的重要参与者，他们对保护地的治理作用应该得到充分认可，原住民的权利实际上会增加保护的成果而不是减少。德班会议后不久，2004 年在吉隆坡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7 次缔约方大会批准了保护区工作计划（PoWPA）。这个工作计划正式呼吁缔约方支持创新型的保护区治理类型，包括 ICCA，通过国家立法和其它有效途径对 ICCA 进行认可；并要求缔约方注意治理的类型和质量、保护中的公平、以及原住民的权利。2004 年在曼谷召开的第 3 届世界保护大会（WCC3）和 2008 年在巴塞罗那召开的第 4 届世界保护大会（WCC4）都同样确认和强调了对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治理类型的认可。

2010 年 10 月在日本名古屋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0 次缔约方大会上，生物多样性公约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SBSTTA）在其建议报告中做了关于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认可的特别建议，指出对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的“认可机制应该尊重长期以来维持原住民 / 社区保护地的习惯法管理体系。”习惯法作为一类社会规范，不仅中国有，而且在世界各地广泛存在。它虽然不是成文法，但在长期的实践中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和习惯性。比如巴珠村对于神山的保护规则就是习惯法。

就在第 10 次《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了 2011 ~ 2020《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制定了遏制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路线图和需要达成的 20 项目标。要实现这些目标，原住民和社区扮演着重要角色，全球范围内很多自然资源实际处于他们的管理和维护之下，他们的传统知识、风俗习惯中包含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长期经验和智慧。比如，“目标 1：到 2020 年，人们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以及他们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方面能够采取哪些措施。”原住民和社区对生物多样性价值的理解和认识往往包含在他们的文化、传统和日常生活中，他们的保护经验和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实践为世界各族人民和现代保护工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有效途径。[5][2]

“目标 5：到 2020 年，使所有自然生境、包括森林的丧失速度至少减少一半，并在可行情况下降低到接近零，同时大幅度减少退化和破碎情况。”原住民和社区在抵御由开矿、森林砍伐、开发建设等造成的栖息地破坏和破碎化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目标 7：到 2020 年，农业、水产养殖及林业覆盖的区域实现可持续管理，确保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护。”ICCA 往往包括农业、渔业、林业等生产性景观，对维持农业生物多样性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这些地区正面临着企业、政府的大规模土地兼并用于单一的经济作物种植或是其它开发项目。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的长久维持将有利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农业生物多样性。

“目标 11：到 2020 年，至少有 17% 的陆地和内陆水域以及 10% 的沿海和海洋区域，尤其是对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区域，通过有效而公平管理的、生态上有代表性和相连性好的保护区系统和其他基于保护区的有效保护措施而得到保护，并被纳入更广泛的土地景观和海洋景观。”据 25 个国家已有的数据预测，社区保护地覆盖的面积可能同政府指定或管理的保护区面积一样大，甚至超过政府管理的保护区面积。[1] 仅就森林面积而言，全球范围内由社区

保护的森林大约是5亿公顷，这至少跟政府管理的森林类型保护区同样重要。[2]如果各国政府在充分尊重原住民和社区意愿的前提下，以恰当的方式认可和支持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将对于实现目标11作出重大贡献。

“目标13：到2020年，保持了栽培植物和养殖和驯养动物及野生亲缘物种，包括其他社会经济以及文化上宝贵的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同时制定并执行了减少基因损失和保护其遗传多样性的战略。”许多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处于农业、水产养殖及林业覆盖的区域，是维持驯养动物和栽培植物，以及它们与野生亲缘物种之间联系的重要场所。典型的例子是，青藏高原牧民们的轮牧草场是饲养家牦牛的场所，但往往也是野牦牛出没的地方。贵州黔东南偏僻的侗族村庄至今还种植着一种最古老的稻种——红色糙米，这个稻种据说已有7000年的历史，虽然产量每亩只有300斤，但当地人仍然坚持用最古老的传统耕作方式种植，使得这一稻种至今保存下来。

“目标14：到2020年，带来重要的服务，包括同水相关的服务以及有助于健康、生计和福祉的生态系统得到了恢复和保障，同时顾及了妇女、土著和地方社区以及贫穷和脆弱群体的需要。”很多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这里能为社区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如清洁干净的水源、适宜的气候、生产生活的原料等等。ICCA的管理目标很多都包括了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而ICCA是基于社区传统的风俗、文化、习惯等习惯法来治理的，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能充分地纳入地方社区、妇女、原住民和脆弱群体的意见。对于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的认可是实现目标14的基础。

“目标18：到2020年，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同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遗传资源有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及其对于生物资源的习惯性利用，根据国家立法和相关国际义务得到了尊重，并在土著和地方社区各国相关层次上的有效参与下，充分地纳入和反映在《公约》的执行工作中。”ICCA的存在就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传统知识和在地实践的集中体现。例如笔者2017年4月曾访问过马来西亚沙巴岛的Tagal，这是一种社区对河流管理的传统方式，社区会根据当地情况设定禁渔区和禁渔期，保证渔业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传统在很多地方已经不复存在。2002年开始，沙巴渔业局开始跟社区建立伙伴关系，帮助社区恢复这种传统的河流资源管理方式，并在沙巴广泛推广，目前这样的Tagal在沙巴有500多个。是政府认可、鼓励传统知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中的典型案例。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也是落实和实现2011～2020《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社会已经充分认识到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的重要作用并对它进行认可。其中一个机制就是全球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注册系统（ICCA Registry）。这个注册系统是由位于英国剑桥的联合国环境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UNEP-WCMC）管理的，这个中心还同时管理保护区世界数据库（WDPA），监测全球范围内其它类型的保护区包括政府管理的保护区。ICCA Registry包括数据库和案例研究的网站两部分，保存着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的相关信息。数据库和案例为原住民和社区提供了一个分享他们保护的经验及面临的威胁和挑战的机会，也给社会各界认识和理解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提供了一个平台。为了充分尊重原住民和社区的意愿，所有提交注册的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也必须同时提交《自由、事先、知情同意书》（FPIC:Free,Prior and Informed Consent），说明注册是全体社区集体同意的决定。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实施的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UNDP GEF SGP），自1992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支持原住民和社区保护以及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在地行动。目前已经在125个国家支持了数以千计个社区保护地。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GEF SGP）中国项目自2009年成立以来共支持了21个社区保护地，其中有9个已经在ICCA Registry成功注册。这些社区保护地都处在中国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和生态最脆弱的地区，如云南、广西、贵州、青海、甘肃等。它们有的是自然圣境，有的与政府的保护区重叠却实践上由社区保护和管理，有的在原有的基础上由民间组织扶持推动，有的已经获得政府的备案和挂牌认可，无论是哪一种形式，这些社区保护地都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保护着中国乃至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地区。

世界各国对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的认可情况并不一样，有些国家在法律和政策层面完全认可和支持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有些国家并不认可，有些国家认识到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的作用，正在探索认可的方式，而有些国家对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认可的方式却是破坏性的。在澳大利亚，ICCA被认可为“土著保护地”。1992年，澳政府承诺要建立一个全面、充足、能代表澳大利亚所有陆地生物区的保护区系统——国家保护区体系。由于有些生物区只在原住民的领地内存在，政府通过一个与原住民组织合作的“土著保护地”项目为原住民群体提供资金和其它支持，使原住民能够在他们的领地上建立保护区。这种“土著保护地”是由原住民自己规划、管理、自愿宣布成立的。政府的项目将“土著保护地”纳入国家的保护区体系，是对“土著保护地”的正式认可，但“土著保护地”并不是政府管理的保护区。政府也认识到，很多政府管理的保护区建立在原住民的传统领地但并未获得原住民的同意，“土著保护地”项目也提供资金，帮助原住民加强参与这些保护区管理的协商权力。澳大利亚的陆地保护区面积约为1.06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4%，其中3650万公顷是土著保护地，相当于澳大利亚保护区总面积的34%。[3]在柬埔寨，国家在《保护区法》中明确规定认可社区保护地，并对其建立、管理、评估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柬埔寨的环境部有权将可持续利用区划分给居住在保护区内及周边的社区作为社区保护地。社区保护地所在社区需要同自然保护管理局签约；如果社区违反协约的条款和管理计划，环境部有权撤销同社区保护地的协约。社区提出自然资源管理规划，并获得自然保护管理局的批准，规划应每3年评估一次，或在必要时进行提前评估。[4]在哥伦比亚，原住民对土地、自然资源、自治享有集体权，他们的文化得到完全尊重。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的总面积3400万公顷，占到哥伦比亚国土面积的30%和全国森林面积的80%，其中非裔哥伦比亚社区拥有500万公顷土地的集体产权，但原住民和社区没有地下资源的权利。社区保护地在哥伦比亚并不能像政府管理的保护区一样得到认可，除非社区同意接受和政府共管的治理类型。原住民和社区正面临着是接受共管模式，还是在采矿特许权面前毫无办法的艰难抉择。[5]在菲律宾，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原住民可以宣布对祖先世居地内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所有权，这种权利由国家综合保护区体系（NIPAS）颁发的“祖先世居地证书”加以确认。这个综合保护区体系同时认可原住民的自治和自主权，包括尊重他们传统的自然资源的管理实践，尊重他们原有的精神、宗教传统、风俗和仪式，并赋予他们维持、保护和进入传统宗教、文化场所的权利。[6]

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恐怕是地球上最古老的保护地模式，同时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当地社会、历史的演变而发生着持续的变化，有的消失了，有的幸存下来，有的又重新出现。尽管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都具有自愿、自组织、保护珍贵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性质，但是，同每一个社区保护地相关的信仰、实践方式、治理机制都千差万别。经历了时间洗礼和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社区保护地，有的可能已经被政府的保护区所替代，但自然资源的实际管理权仍由社区掌握，有的可能在强大的外力干涉下已经失去了社区治理的能力，有的将传统知识和现代科学相结合、进行着新的保护实践，有的可能在现代化的巨大压力下仍然牢牢抓住自己的文化、坚守着古老的传统，有的可能正在同外来的开发力量苦苦抗争。

在现代化大潮裹挟下的社区保护地正面临着诸多威胁：资源开发、土地侵占、被强行并入保护区、气候变化、本土知识破坏、文化传承断裂、内部治理机制丧失等等。除了社区需要加强凝聚力及代际间的传承外，政府、民间组织、国际社会都应该加强对社区保护地的适当认可和支持，在充分尊重社区的前提下提供必要的帮助，让这种最古老的保护地在地球上焕发长久的青春。确保原住民和社区对自然资源进行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权利，能有效对抗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而且是最有效、成本最低的方法。中

参考文献：

[1] [2] ICCAs &Aichi Targets: the Contribu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y to the Strategic Plan for Biodiversity 2011-2020.

[3] An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law, national legislation, judgements, and institutions as they interrelate with territories and areas conserved by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report no.18 Australia.

[4] Pprotected Area Law of Kingdom of Cambod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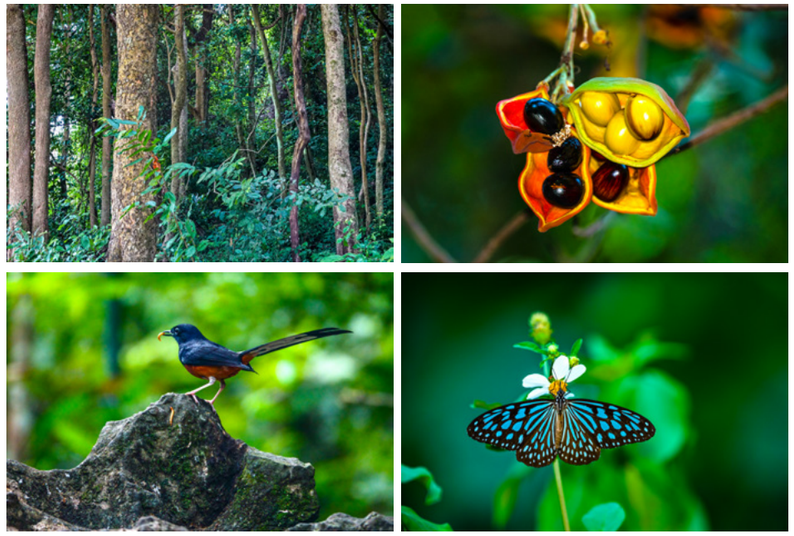
[5] A glance of ICCAs and ICCA Consortium, PPT by Grazia Borrini-Feyerabend.

[6] An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law, national legislation, judgements, and institutions as they interrelate with territories and areas conserved by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report no.16 The Philippines.

渠楠 白头叶猴的家园

文 / 叶卫东 摄影 / 程斌、梁霁鹏、Okranz、宋晴川、《中国周刊》记者 杨剑坤
支持机构 / 美境自然

渠楠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保存相对完整，紧邻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气候温暖，四季常绿，群山环抱，具有得天独厚的气候地理优势。



组图：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极度濒危、中国特有物种——白头叶猴全球种群的12%就生活在渠楠。除此之外渠楠还有二级保护动物猕猴，已观察到的四十几种鸟类等动植物。

2017年11月8日，《中国周刊》走进广西崇左市扶绥县山圩镇昆仑村渠楠社区保护地。

车子从南宁出发，大约两小时后，转上一条进入渠楠的简易红土路。路面坑洼不平，而且有弯道。路两边的青绿山峰夹峙出一片片谷地。陪同我们的渠楠屯长滕文超说，本地的山都带有一个“岜”字，是由壮语的“山”引伸而来。眼前的叫岜离山，更远些的是岜圆山。

渠楠地处低纬度，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暖，四季常绿，再加上群山环抱，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山峰险峻但不高，而且植被葱绿繁茂。这里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头叶猴，二级保护动物猕猴，还有已观察到的四十几种鸟类。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保存相对完整，又紧邻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极度濒危、中国特有物种——白头叶猴全球种群的12%就生活在渠楠。

从2008年到2010年，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FFI）与广西环保厅、林业厅共同合作，用中欧生物多样性项目尝试建立了14个自然保护小区。2014年，美境自然（全称广西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协会）对这些社区进行回访，发现有一半小区在项目结束的情况下依然发挥作用。于是美境自然在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及CEPF支持下，同广西林业厅启动第二次合作，探索自然保护小区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渠楠是四个新建保护小区试点之一。2014年，经渠楠屯委、社区动员，村民代表大会投票、递交申请，最终经扶绥县林业局批准成立

组图：保护区管理局及其下属的岜盆管理站联合美境自然，多次走访渠楠，了解渠楠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志愿巡护队，兼任了整个屯的安全防卫工作。

了保护小区。期间及其后村里和美境自然一起开展了多次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生物资源本底调查。

渠楠是一个壮族自然村，有居民 110 户，总人口 450 人左右，经济来源主要依赖甘蔗、西瓜、柑橘、玉米等作物。全屯约有旱地3500亩，水田 360 多亩（原种水稻，后改种甘蔗、玉米等）。几乎家家有水牛和牛车，用来运输甘蔗和农作物。有一家养牛大户，还有两家专业养羊户。近几年甘蔗价格低迷，渠楠村民从甘蔗种植转向柑橘类水果种植。由于人均土地面积较多，渠楠外出务工者较少，农闲时节会有部分村民外出打短工。相比其他社区保护地而言，渠楠屯收入水平相对较好，90% 以上的家庭都有楼房，富裕家庭还购置了小轿车。

渠楠保留着壮族的许多文化习俗，如传统的集体议事制度等。村里有神龙庙和土地庙，每逢春节及农历三月三等传统节日，村人都会前往祭拜，祈求风调雨顺、家人平安。农历五月初四全村到神龙庙聚餐，也是端午时对“龙”的祭祀。农历十一月，屯里会举办丰收节，大家饮酒庆祝。现在仍有老人会唱壮族采茶歌，编竹筐，懂草药，知道如何猎取野生动物等。

渠楠社区保护地的峰丛谷地多被开垦成为农田，但石山上还保存有相对比较完整的雨林生态系统。据村民回忆，社区保护地内的森林曾在 1958 年被大面积砍伐，但有一些地方如神龙庙周围的林子却从未动过刀斧。屯里有三片祖传的风水林，林中古木沧桑，幽暗阴森，让人敬畏。土地庙和神龙庙位于两片风水林。在村人心目中，风水林的一草一木都不能损害。以往破坏风水林或对土地庙、神龙庙不敬，以致遭到报应的故事在村里一直流传。屯里要求承包山场的村民，将山脚部分植满树木，产权归属个人，但永久不得砍伐。这是“风水林”的扩延，客观上给白头叶猴提供了更多食材选择。

推动保护小区的建设和发展

渠楠社区保护地发展的完善，外部机构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张颖溢，美境自然创始人，北京大学环境与生态学学士和动物学博士。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专家和灵长类专家，她曾在广西崇左开展白头叶猴的野外研究和保护，在白头叶猴的行为和生态学方面取得开创性研究成果。

美境自然对于渠楠社区保护地项目的良性发展，一直发挥牵针引线式的作用，在社区保护地多次开展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的本底调查，为社区保护地的成立、日常管理，及开展自然教育活动奠定了较好基础。他们不仅是渠楠社区保护地的发起者，也是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它对渠楠的支持主要在社区保护地的能力建设、提高社区自治、推动自然教育和生态农业、帮助对接外部资源和改善政策环境等方面。在自然教育基地建立过程中，他们为渠楠众筹了用于自然教育的球场灯光照明、投影仪、摄像机、望远镜、巡护服等一系列设施和设备，极大改善了自然教育的条件。渠楠成立社区保护地并开展自然教育之后，社区在社会资本、环境资本、人力资本、物资资本和资金资本等五方面都有提高，尤其社会资本的提高是最明显的。由于社区保护地得到政府认可，并且采用的是自筹、自建、自管理和自受益的方式，所以社区明显得到赋权，社区的内部自我治理能力也明显提高。这不仅仅体现在社区内部集体决策、内部凝聚力、集体认同感、文化归属感、社区自豪感的增强，而且社区与村委、乡政府、县政府、保护区、NGO、企业以及来过社区访问的机构和个人都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社区内部也更加的团结，相互之间更加信任。社区内各群体的能力提高也是非常明显的。

政府支持社区自治 NGO 协助群众获益

2014 年 12 月，渠楠在扶绥县林业局的支持下，成立了保护小区。渠楠社区保护地和保护小区的成立以及渠楠的可持续发展一直都得到了保护区、县镇政府、美境自然、UNDP GEF SGP 等外部机构的大力支持。2015 年 6 月，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协助渠楠争取到了扶绥县政府的扶贫资金，帮助渠楠屯清理了村内的池塘，将原来流入池塘内的污水进行了管道处理，岸边道路进行了改善和绿化。池塘的清淤和环境整治，使得村庄的景观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而且，由于这个池塘也是野生白头叶猴在旱季常来饮水的场所，因此水质的改善也有助于对白头叶猴的保护。2017 年 7 月镇政府承诺帮助渠楠修建通往村外的 3 公里左右的乡村公路，改善渠楠的交通条件，也为开展自然教育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由于渠楠社区保护地良好的管理成效，2016 年被广西林业厅列入重点支持的保护小区，得到 5 万元的资金扶持用于购买望远镜和巡护服等设备。

2014 年 7 月至 8 月，保护区管理局及其下属的岜盆管理站联合美境自然，多次走访渠楠，了解渠楠的社会、文化、经济和生态等各方

组图：为了重建城市儿童与自然的联系和情感连接，美境自然让城市的孩子参与自然教育活动，走进保护小区，了解和接触白头叶猴。

面的情况，并与屯委、护林员和村民代表沟通，建议渠楠按照《广西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小区建设管理办法》向扶绥县林业局申请成立自然保护小区。保护区还与扶绥县林业局进行了积极沟通，获得了县林业局大力支持。2014 年 9 月至 11 月，渠楠屯委就成立自然保护小区的事宜先征求了党群议事会十多位成员的意见和建议，在获一致同意后又在全村进行动员，挨家串户征求意见。11 月 9 日，屯委召开大会，100 多位村民代表参加会议，并对成立自然保护小区事宜进行表决，获全票通过。渠楠村民建立社区保护地的目的，是为保护分布在渠楠屯的生物多样性及其中分布的珍稀濒危动植物，希望社区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世代传承下去，让渠楠发展得更好。

NGO 主要帮助和陪伴渠楠社区保护地提高自治和管理能力，帮助其争取外部的支持，协助政府做好监测和评估；深入了解社区的历史、治理架构、审美艺术、信仰崇拜、节日习俗等，协助社区找寻和建立合适的保护地管理模式，而不是把保护小区当项目来做。作为外来者，NGO 在工作中，了解社区需求，协助社区形成共识。通过宣传、政策、市场、文化恢复等多重手段让社区从保护中获得多重效益，避免只靠金钱激励和动员社区群众。渠楠社区保护地建成自然教育基地并持续开展自然教育活动之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志愿巡护队“零破坏”的巡护目标

渠楠屯社区保护地和保护小区成立以后，屯委成立了由四人组成的自然保护小区管理小组，其成员包括屯长 1 人，副屯长 2 人及昆仑村委文书 1 人。管理小组内部有明确的分工，内部也有决策机制。管理小组制定了保护小区的村规民约在社区内进行了公示，并在社区的成立仪式、社区会议等多种场合进行了宣传，集体议事时村民无异议。

同时，屯里建起一支由 17 位年轻人组成的志愿巡护队，其中巡护队长 1 人，直接向管理小组汇报工作。考虑到渠楠屯的实际需求，屯委还因地制宜让巡护队兼任了整个屯的安全防卫工作，提高了巡护队成员的积极性。村民们积极参与到保护小区的管理中，在日常农业生产中监督村规民约的执行，以及白头叶猴和栖息地的变化。如果见到外来人员擅自进入社区保护地范围内有违反村规民约的行为，村民会进行询问、劝阻并及时报巡护队处理。巡护队若处理不了，则会让兼职护林员进行处理。若已经达到违法的程度，会上报给岜盆保护站来执法处理。一般在破坏还未造成之前，违规行为就能够得到劝阻和制止。

2017 年初，巡护队确定了新一年工作计划，以及对白头叶猴的保护行动计划，首次提出了社区保护地“零破坏”的巡护目标。

在严格的巡护管理下，农田或桉树林侵蚀白头叶猴栖息地的现象，近期再没有发生。目前主要的威胁还是外来人员及个别村民上山捕鸟、放置铁夹等捕捉野生动物，以及偷盗观赏性树木如金花茶和紫薇等。巡护队员还发现外来人员会利用阴雨天以及村里大型节日村民不在田间劳作时，乘虚而入进入社区保护地。例如有外来人员因为想取马蜂窝而砍了土地庙周边的几棵树。为吸取教训，巡护队在特定时间加强巡护，管护能力正在日趋成熟。

连接城市儿童与自然的教育活动

为了更好地保护渠楠白头叶猴保护小区的生态环境，也为了重建城市儿童与自然的联系和情感连接，美境自然采用了在渠楠开展自然教育活动的方式，让城市的孩子参与自然教育活动，亲身走进保护小区，了解和接触白头叶猴等喀斯特生物、乡村文化以及保护工作，社区居民也自愿参与到自然教育活动中来。社区的代表多次参加各种培训和考察，提高自己在自然教育和生态农业方面的观念意识和能力。

渠楠从成立社区保护地起就开始进行白头叶猴自然教育基地的建设。2015 年 1 月，保护小区刚批准成立，就接待了第一次冬令营。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 16 个家庭参加了白头叶猴自然之旅。渠楠的许多村民也都直接参与到自然教育活动中，14 户村民为此提供住宿和餐饮，儿童青草社则直接参与自然教育课程，巡护队为自然教育提供安全防护和野外解说，妇女文艺队参与课程中与壮族传统文化和生活相关的活动。2016 年在自然教育活动中，村民已经能够参与 10% 左右的讲解，介绍村庄自然、文化和历史。

截止 2017 年 6 月，渠楠的自然教育基地共举办过 21 次自然教育活动，接待了超过 600 人次，渠楠通过此活动获得收入 19 万元，其中大部分为接待户、后勤服务的收入，小部分为村庄提留的社区保护地管理经费，主要用于保护地日常的管理以及社区公共事务。如今渠楠白头叶猴自然体验营和科考营已经成为渠楠自然教育基地很受孩子们欢迎的课程。

开展自然教育后，社区有许多来自大城市的或重要的来访者，这使得全村都对自己的保护地、拥有的白头叶猴和优美的生态环境、村庄的传统文化等都产生了自豪感，相互之间也更为团结信任。来渠楠参加过自然教育课程的许多亲子家庭都与渠楠保持着日常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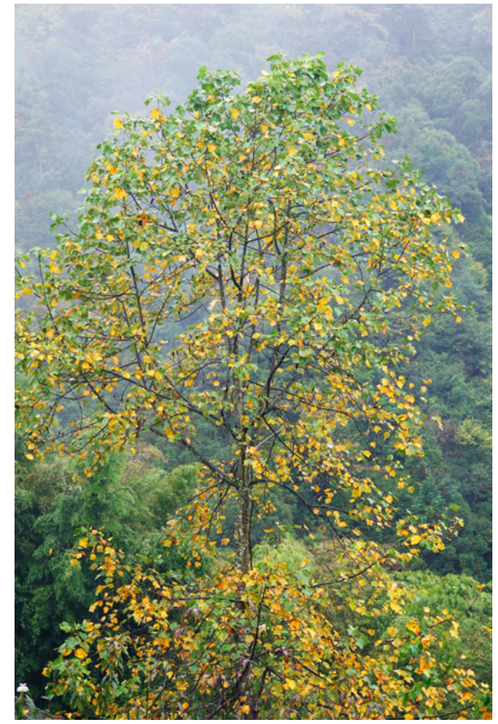
渠楠社区保护地成立后，白头叶猴种群数量明显增长，栖息地面积也在不断扩大。在保护小区成立之前，调查确定的白头叶猴种群数量 9 至 10 群，85 只左右。而在 2017 年的监测中，发现有猴群 15 群，数量 130 只以上。居住地附近的几个猴群都有幼崽出生且都存活下来。以前，白头叶猴栖息地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农林用地的蚕食以及外来人员偷猎盗树等。社区保护地成立后，土地蚕食现象已完全杜绝，外来违法行为也在减少。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效益非常显著，村庄面貌焕然一新，全村的凝聚力和自我管理能力显著提高。

从渠楠社区保护地的成立及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社区不仅提高了自己的自然资本，而且渠楠社区保护地充分利用了生态和文化资源的优势，让社区内部的各个利益群体都从中受益。这使得渠楠村民都有很高的积极性参与到白头叶猴的日常保护和监督中。如果渠楠未来能够成功地向生态农业转型，将能更好地可持续利用自身的资源走上绿色发展道路，渠楠白头叶猴保护小区也将管理得更好更持久。

村民用法律捍卫鹅掌楸的天堂

文/叶卫东 摄影/杨波、《中国周刊》记者 杨剑珊
支持机构/贵州省人类学学会

2015年，天星界风力发电厂在老寨村山上安装风力发电设施，修路时滚落的碎石，压坏半山的鹅掌楸树林。



组图：老寨村目前拥有国内已知最大的一片鹅掌楸天然林。树木为老寨村民几乎提供了全部生活保障，村里房子都是木制的，连房顶也是树皮做的。

2017 年 11 月 11 日，《中国周刊》开始了前往贵州省黔东南州剑河县南哨镇老寨村的行程。

下午从贵阳出发，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夜幕降临后到达剑河。第二天一早往老寨村出发，一路崇山峻岭，公路缠绕在大山之间。高山云雾中不时出现苗家山寨，风情浓郁，景色美丽。近午车到南哨，正逢赶场日，背篓的苗族女孩盛装出行，成为镇街上靓丽的风景。从南哨前往老寨村，道路变得十分难走，大山间雨雾茫茫。由于正在修路，车子行进很慢。进村的最后一段路，车不能通行，村主任杨代禄调遣摩托车把我们接进了寨子。

老寨村（现与坪寨村合并）目前拥有国内已知最大的一片鹅掌楸天然林。鹅掌楸隶属木兰科鹅掌楸属，是第四纪冰期残存的孑遗树种，为我国特有品种。老寨村也是国内最先通过 UNEP-WCMC（联合国环境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的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注册系统（ICCA Registry）登记的自然保护地之一。

1988 年，剑河县人民政府在老寨村约 50 公顷的集体林地上，建立了县级“鹅掌楸自然保护区”，并以“乡规民约”形式制定规章制度，作为村民对该保护区进行保护的主要依据。但当时的自然保护区并没有专门的机构、人员和经费，从管理而言是一个“空壳”。而鹅掌楸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因此不断面临社区内部和外部盗伐及破坏性采集树种的威胁。

老寨村从 1980 年开始出现滥砍滥伐木材的现象。尤其在 1985 年到 1987 年间，最疯狂时每天有上百人进山砍树，外地老板坐地收购木材。有人靠砍树就能取得巨额收入。而盗采鹅掌楸树种从 1998 年开始。

1983 年，鹅掌楸山林被确认为老寨村所属，1988 年由县里立碑，并以通告形式明确保护区面积、保护目标、管护、奖惩等内容。1989 年由黔东南州环保局出资 1 千元定桩，确立保护区边界。保护区日常管护工作由村委会组织，民兵连具体负责实施，无固定管理费用。剑河县环保局发放过三次现金（2000 至 3000 元左右）。由于保护区属天然林保护工程区，剑河县林业局给村里三个护林员指标。其巡护范围包括保护区，每人月工资 100 元，月巡护 10 天。

剑河县环保局鹅掌楸保护区负责人刘清，多次带人到老寨村进行调查和协助开展活动，与村民一起制定老寨村可持续自然资源管理的行动计划。村民由此意识到，树木和他们的关系很大，一致认为鹅掌楸是先辈留给后人的共同财产，应该好好保护。在 2003 年一次会议上，刘清与村民反复讨论，最后村民全都同意重新建立保护山林的组织。在村委统管下，成立由青壮年组成的林防队，每个村民组推选 1 至 2 名年轻力壮、有责任心的护林人员，组成一支有力的防护队伍。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点分歧，主要是针对现有鹅掌楸的组别权属问题，刘清和村支书引导村民正确认识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使他们认识到如不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今后继续发生严重破坏行为，谁也不会有收益，让村民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

经村民大会，推选出 11 位勇于负责的护林人员，并明确各人的职责。组长负责调动各护林人员巡山，监督财务，同时号召村民参与保护区的管理，让大家作保护区的主人；副组长协助组长工作，参与管理；会计和出纳负责账目的支出预算，坚持公开、公平、透明。最后，制定保护小组的活动规则及保护决议：凡属本村的村民，人人都有高度护林监督责任和义务；凡林区内野菜、杂木、药材等，不准任何人私自采取砍伐；凡保护区内的野生动物（飞的、跑的）一律不准捕捉。常年保护方式是，每年 1 月至 6 月期间，每天保持 2 人进山巡查；6 月到 9 月底种子成熟时期每天不少于 6 人巡山；无正常批准手续一律不准进山摘种，采种时不得攀折树枝，按承包或统一采摘。组长统一组织管理，做好自然保护区的一切工作。

从 2013 年 10 月起，贵州省人类学学会在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的资助下，在贵州示范

组图：由青壮年组成的林防队号召村民参与保护区的管理，让大家作保护区的主人。

大学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研究中心任晓冬、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源与环境保护研究中心李晟之两位专家的大力帮助下，开展了“贵州老寨村和青海措池村两种典型生态系统社区保护地可持续建设项目”。社区保护地是指“包含重要生物多样性价值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由土著和地方社区通过习惯法或其他有效手段自愿保护的自然的和/或改良的生态系统”。

社区保护地关键处是农民依靠集体行动自发地采取保护行动。贵州省人类学学会选取了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10年以上的老寨村。老寨村于1988年开始在外界的帮助下开展社区保护地建设，在外界项目支持结束后，社区仍然自发地继续开展监测巡护和自然资源管理。贵州省人类学学会希望通过项目实施了解社区为什么要自发地开展保护活动，开展保护活动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希望如何得到外界的适度支持。并采用奥斯特洛姆教授提出的“长期存续自然资源管理八项原则”，结合在社区保护20余年的工作经验尤其是教训，设计出“社区保护地管理可持续评估指标体系”，利用项目提供的机会，测试项目指标体系，一方面加深对项目村社区保护可持续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对指标体系进一步修改完善。随后根据管理可持续性评估的结果，针对项目村存在的问题，通过制定自然资源管理制度来加强管理可持续性，涉及的活动可能包括资源调查、制度建设、能力建设、经济建设等若干方面。在短时期内，把项目村在原住民及社区保护地信息系统（ICCA Registry）进行了登记。

2013年10月，贵州省人类学学会开发完成了《社区保护地管理可持续评估指标体系》，对老寨村进行了社区保护地管理可持续性评估，评分为79分（100分满分），或许代表了目前中国社区保护地可持续管理比较好的水平。在评估的基础上，制定了自然保护地的长效机制评估报告。2013年12月至2014年4月，又对老寨村的鹅掌楸森林资源进行快速评估，发现其自然资源得到了良好保护，而且目前受到的威胁程度较小。

2014年6月，他们在贵州省林业厅的支持下，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了2000株红豆杉树苗送到老寨村。由于红豆杉树苗太小，村民们认为种在山坡上会被羊群啃食，就集中种在一块土地里，等树苗长大些再移栽到山上去。从2014年6月开始，他们先后四次进入老寨村，反复向不同群体的村民，如

社区精英，妇女、老人等等讲解社区保护地保护知识和申请ICCA，为2015年初召开社区大会讨论是否申请在ICCA注册做准备。

剑河县林业局以“剑林呈2014年71号”文件对老寨村社区保护地申请ICCA注册给予明确支持，并配套4.2万元在老寨村开展农村能源项目。作为具有较长历史且得到村民们积极支持的社区保护地，在“政府部门最低限度认可”和“能够获得多种支持”两项得分都是满分，这与社区长期得到来自政府与民间环保组织支持是不可分的。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边界不清晰，反映了社区保护地权属问题是可持续管理最大的薄弱环节，如何把权属问题加以明确是这个项目未来非常重要的努力方向。

《中国周刊》通过采访村主任杨代禄和村民代表，对鹅掌楸社区保护地现状做进一步了解。杨代禄从2005年起担任村主任。据他介绍，近些年来老寨村鹅掌楸林地面积向两厢大大扩展，已从上世纪的50公顷上升为约300多公顷（近5千亩）。原始森林中，二三十米高的鹅掌楸树，已很常见。鹅掌楸社区保护地管理工作更加趋于正规化、专业化。护林员每天巡山，早上九点钟出发，晚上六点回寨。平时是三人为一组，中午自带午餐。近几年砍伐树木、盗采树种的现象已很少发生。2015年秋天，黎平县有五个人骑摩托车过来偷采金钱柳叶子（可制成市场价格较高的保健品）。护林员很快发现，并用手机向村里报信，全村人立刻出动去围堵。然后扭送派出所接受处罚，并且让对方保证决不再犯。一般中秋节前后，是最为紧张的日子。那时树种成熟，是盗采（或偷挖药材取马蜂窝等）活动高峰期。村里每天要出动多人次上山巡逻，从黎明到夜晚严防死守，不让盗采者得逞。至于在山上过夜值守，也是常事。

2015年，天堂界风力发电厂在本地山上安装风力发电设施，修路时滚落的碎石，压坏半山的鹅掌楸树林，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在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自然之友及贵州省人类学学会等外部机构的协助和指导下，对照相关政策法规，老寨村全体村民走上维权的道路，尤其是通过政府部门和风力发电厂交涉，最后风力发电厂给予老寨村180万元人民币的补偿。这一行动大大提高村民法律意识，也更增强了他们坚定维护鹅掌楸社区保护地的信念。中

老君山的生态救赎

文 / 《中国周刊》记者 刘霞 摄影 / 丁平君、《中国周刊》记者 杨剑坤
支持机构 / 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

作为三江并流核心区域之一，老君山位于大理、丽江和怒江州交界处，该山脉不仅是澜沧江与长江的分水岭，同时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的主要栖息地之一，因而这一区域具有重要的生态保护价值。

在滇西北横断山脉纵深处的老君山，金沙江环其左，澜沧江绕其右，为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的核心区，特有物种众多，是全球2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地区之一。但近30年来，大片的原始森林被村民们砍得有点猛，各家山头划出来的集体林和国有林成为乱砍滥伐的重灾区，村里人每年为这点木头都要跟外人“火拼”一场。今天，走进这里仍会看到过去大规模砍伐林木时搬运木材的滑道。山顶粗壮的云南松被砍倒后，经此滑到山脚，再被运往全国各地。

靠山吃山，砍树卖钱，这是当地人如吃饭喝水般的生活逻辑。可是，看着昔日绿意浓浓的大山慢慢变秃，村民们内心十分清楚，照这样砍下去，早晚有一天，山上的树会被砍光。可是，吃饭需要钱，盖房子需要钱，娃娃读书需要钱。如何突破生存与环保的博弈困局？

从2010年开始，邓仪和他的团队选择了生态最为脆弱、社会冲突频发的老君山，寻求社区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解决之道。邓仪认为，不能只管环境，不管人，“凭什么要保护环境就得剥夺当地人对世代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的利用？”在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GEF SGP）的支持下，他们发起“三江并流区域可持续发展”项目，力图通过促进当地社区的自我决策、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来实现人和自然的共赢，也为解决“公地悲剧”进行制度上的探索。

“村寨银行”捆绑生态保护

47岁的白族农民李玉坤和妻子正在自家院子门前为采摘回来的白芸豆进行初步加工。虽是初冬，中午阳光正好，他仅穿了身短袖，“干起活儿来挺热”，他咧嘴一笑。

李玉坤是丽江市玉龙县九河乡河源村的村民。四百多户河源人家世世代代生活在老君山东南部边缘，14个村民小组35个村落，像散落的星星，分布在108平方公里的崇山峻岭之中。

河源是最早启动“三江并流区域可持续发展”项目的村子。邓仪所在的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以内生式社区项目发展理论为指导，在河源村开展了包括村民能力、公共管理系统、金融系统及可持续产业建设等工作。

李玉坤所在的村子，还自决划定了社区保护区域，并与“村寨银行”结合制定相互关联的制度。通过“村寨银行”，村民们不仅达成保护生态环境的共识，而且有了生产发展的资金。

“村寨银行”，在外人看来有些不明就里，可那些很少走出过大山的农民，却能头头是道地解释给你听：“我们村民自己的银行，就叫村寨银行，用来干什么，我们自己说了算，把森林保护好了，我们就能更好地发展嘛。”在河源村，一位村民脱口而出。

“村寨银行”，脱胎于邓仪1990年代中期在贵州草海实施的小贷模式——“村寨基金”，其目的是帮助村民在环境保护的同时发展经济。它以村民小组为单位，村民按户自愿等额入股，项目以1:1的比例注入配比资金后组成本金。通过公平抽签，分三批次轮流进行等额借贷，如每户入股1000元便可获得6000元的贷款，期限为1年。所有参与者都必须签订环保条约，如有违背制度者将从其入股资金中进行处罚。

李玉坤所在的新房组率先搞起了“村寨银行”。不过，李玉坤表示，“刚开始时很难，大家开了不下二三十次会议。利息怎么定，金额怎么定，管理怎么定，每次开会大家都在争吵。”在项目组的监督下，通过一次次开会，争吵，妥协，最终村民们磨合出一套共同认可的制度。

“整个项目，每一步都不是我们设计的。”项目官员耿得安说，搞村寨银行是基于村民的认知，所有人在利益博弈里面，形成互利制衡的制度。

获得首批6000元贷款的村民，一年内凭借这些贷款搞养蜂、种天麻等，平均赚了3000多元。三年项目期过后，当地政府认为项目很好，也配比了相同的资金，使得当地村民每户可以贷款到1万多元。1万多块钱对于村民做点小生意，多种点赚钱的农作物有很大帮助。

“村寨银行”在河源村实施7年，有专业志愿者在连续不断的监测下得出数据：每户村民使用“村寨银行”一年的周期后，能够为他的家庭增加60%的收入。

李玉坤甚至提出了将“村寨银行”跟山林保护形成联动的主意。既然已经获得了外界的经济援助，那么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家园。如果村民参加了“村寨银行”项目还要到山上砍树，那么他的股金将被作为罚金扣除。

以前山林保护的责任主要由村长和护林员担负，但那是少数人监督多数人，根本没有效果。而“村寨银行”与山林保护的联动，直接将村民个人利益同山林保护挂钩，形成了多数人监督少数人的机制。这一规定对当地的生态保护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李玉坤点了一根烟，猛地吸了几口，沉吟片刻说：“邓老师他们团队的钱不多，对GDP一点意义都没有，更重要的是将社区公共管理经验引入河源村”。

巨甸镇金河村，有着九千多亩林地，这里山高林密，至今依然有十几头熊出没。从村民中熊、猴等姓氏可看出，这是个曾经以狩猎为生的村子。据胜和四组组长雀汉文介绍，在“村寨银行”建立之前，村里经常有人去山上偷树卖，还有外人出上万的高价收购山里一种叫声像娃娃的珍稀禽类，自从该村和“村寨银行”联动建立社区保护地以后，再也没有人去砍树了，村民也自觉将打山林主意的外来人挡在了山外。

雀汉文说：“谁有那么大的胆子啊，

组图：今天，老君山深处仍可零星地看到砍伐林木的现象，遭砍伐的林木被随意堆放在一旁。村民靠山吃山，树木被砍下来后用来烧制木炭，以换取生活所需。烧木炭的原木主要是天然阔叶林，砍伐后会加剧水土流失。山头渐渐被掏空，留下大片裸露的黄土。

组图：河源村是玉龙县九河乡下属的多民族杂居区，居住着纳西族、白族、普米族、傈僳族、彝族和汉族等民族。村民们开会讨论社区内的公共事务，行使自我管理的权利（左图）。在村寨银行的启动仪式上，村民们通过抓阄的方式，分批次获得小额贷款。村民在公开举行的项目竞争会上，向大家讲述自己的项目建议书。他们团结起来一起做事，养蜂、生态农业的开展，让他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如果一个人违反约定砍树了，打猎了，他的林权证和自己交的本金就会被扣下，严重的时候同村村民的借贷资格甚至也会被取消”。

农民教农民

长年累月扎根在农村的邓仪，一直跟农民打交道，多年来浸泡在不同文化地域、不同民族风情、不同生态种类的经历，使他深刻地感受到，能不能帮助农民自己学会与外界打交道的能力，能不能让真正草根的人参与到项目中，是项目成功的关键。

在“三江并流区域可持续发展”项目中，有三分之一的资金是用于培训的。他们培训的不同之处在于——让农民教农民。邓仪笑称：“我们永远不会找个大学教授教他们该怎么样。大学教授讲完了，拿完讲课费后，农民今后遇到的问题和损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在河源村，项目组的第一笔钱便是用来让村民代表出去学习别人的经验。14 个村组，每组选出一个代表，组成考察团。代表要诚实，把看到听到的记录下来，回来后讲给村民。如果讲不清楚，就得自己把钱补上。

代表们去了贵州毕节下面的贫困村古胜村，那里村民的年收入 600 多元，石漠化十分严重。国家强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管制无效，村民与政府发生过多次冲突。但后来在项目的促进下，村民却自发实现了全面保护，还发展了生态产业。

这一下激起了河源村民代表们的兴趣，他们耐下性子来听，古胜村民如何组织起来，集体修路，制定封山规则，建立村寨银行以及发展生态产业。河源村民开始相信，原来，我们自己可以来保护山林，同时享有保护下来的成果。

李玉坤笑称那几年自己都在东学一下，西学一下，整个就是“农民再就业工程”。李玉坤读了两年高中，在村里算是有一定文化的人，在邓仪的影响下，他对乡村治理开始了有意识地思考，“尊重主体”“多元并存”“参与权”“表达权”这样一些词汇不时地从他的嘴里蹦出。读书是他自我成长的手段之一。他读《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他读《苏菲的世界》，他经常问自己：“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他甚至还读了连上大学的女儿都没听说过的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文化上的自信需要历炼，需要脚步走出去，需要眼睛望出去。几年来，项目中心带村民去四川、广西、内蒙古、甘肃、陕西，甚至还去过香港。让他们学习另一块土地上的农民做的事和经验，也会建立他们文化上的自信。

耿得安经常下乡，每次见到熟悉的村民都会发现他们身上慢慢发生的变化。一次他带领志愿者核实村民提交的生态保护与“村寨银行”联动的项目协议，由于涉及的区域面积较大，金河村胜和三组组长而秀成当即提供给他们一份他亲自手绘的当地社区保护地示意图，他们按照示意图的提示，顺利地完成了走访。耿得安满心佩服，他说：“当我们平等地尊重农民的选择和文化时，你会发现，他们不比任何人差，因为这是他们千百年生活的土地”。

当然，有些东西还是需要“专家”来教的，比如种天麻。保护团队把陕西最会种天麻的农民请来，教村民们怎么有性繁殖。这是科学家们千百回实验后得到的技术，经农民教农民，最接地气，也最易领会。这样一个过程，在邓仪看来，有分享，再有见识，然后才会有选择，“你如果永远吃的是玉米饭，让你点别的饭，你都不知道怎么点”。

农民善治

“我们可以说是唯一一个老百姓可以通过打分来分 NGO 资金的项目”，邓仪如是说。他介绍，各个村以小组为单位，村民民主讨论社区发展方向，制定项目建议书，并参与由社区代表打分决策的项目竞争申报会，通过演讲、答辩与打分等程序，获得项目资助并自主实施。邓仪觉得，通过项目的竞争，重新了解老百姓怎么思考，怎么界定人和自然的关系，怎么界定发展，包括他自己的发展方向。

各小组参与的项目，要由村民自己来提。参与项目申报的小组代表按抽签的排序，轮流上台陈述由小组集体讨论出来的项目实施方案并回应评委们的提问，陈述完后由政府、中心、外请社区专家以及村委会代表组成的评委团进行现场打分。

邓仪说：“看到有些糟糕的项目我们很想帮他们说，但是制度不能让我们说”。

交上来的提案五花八门，有药材种植、道路维修、养猪养蜂、等等。有一次，评委问一个想发展蔬菜大棚的代表：你们离村干道和城里那么远，菜怎么运出去？对方哑口无言。

有时，项目工作人员怕摆上台面的竞争会让村民当场吵起来“伤了和气”。在通知各组代表开会时他们会用“相互学习”这个说法，来削弱现场的火药味。

金河村胜和四组组长雀汉文，参加过一次项目竞争会，在十分钟的陈述时间内，他把“我们要做什么？怎么做？怎么组织？怎么分配”用傈僳语阐述得清清楚楚。最后，他以饱满的热情和可行性极高的核桃产业发展规划，夺得了最高分。

农民的自我管理，也使得“村规民约”具有极好的执行度。

2016 年，黎明乡黎光村河上组建立了一个村民自己的鱼类保护区，保护此地特有的珍稀鱼种：竹根鱼。为此，全体村民讨论通过了社区保护地制度，这个制度规定，任何人不得在本村河流内从事捕鱼、电鱼、毒鱼等相关活动，一经发现，罚款 3800 元。

2017 年 4 月 30 日下午，邻村的两位中学教师因在保护区违规

钓鱼，撞到了村民制度的“枪口上”。河上组组长兼“村寨银行”主管李海云通知全村每家每户必须至少派一个人到达现场，不来的将扣其“村寨银行”本金。仅仅半个小时，全村家家户户都赶到了到场，他们认为此事事关社区保护地制度的存废，如果不对这一起钓鱼事件重罚，以后根本无法约束村民，绝对不能开此先例。

对方求助的电话打到了黎光村党支部书记蜂金龙那里，蜂书记说，这是河上组制定的制度，既然是制度，就要严格执行，他管不了，也没有权力管。后来，他索性关掉了手机。

村民和钓鱼者在吵吵闹闹中对峙了八九个小时，村民们坚持要罚款 3800 元，而钓鱼者则认为自己完全不知情，鱼也并未钓上来，而且认为“村规民约”并不适用于外村人。事态陷入僵局。后经黎光村委会黄主任调解，事情最终以对方被罚 500 元收场。

此事在当时成为当地的轰动事件。让邓仪没想到的是，捕鱼罚款事件后，全村人坐下来开了一个会议。他们讨论、总结并反思，为什么大家吵吵嚷嚷八九个小时，还是吵不出个结果？他们反思的，不是找谁罚了款，而是在制度执行过程中的明细度不够。

在邓仪看来，某种意义上说，村民们事后的这种态度已经上升到政治家的高度。“我们很多历史事件，错了就错了，我们寄希望于哪个人来拨乱反正。而村民们在遇到具体问题时，是以修正的态度来面对，他们认识到应该细化规章制度，如本村人违规罚多少，外乡人罚又是多少；钓上鱼和未钓上鱼应该有所区别。他们的做法，是许多专家、学者，以及所谓的精英阶层想像不到的。”

生态产业化

生态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村寨银行”成立后的又一组织，其目标是引领全村村民致富，生态产业被定为合作社的发展方向。合作社建立了统一的财务制度，成立了财务小组；完善了内部管理制度，选举出了监事会；形成了全村所有自然保护区和保护制度联动并互相监督的决议；从而在全村的层面搭建了全新的社区公共资源共管平台。

金河村原来以种烟叶为主，烟叶需要大量木柴烤制，显然不属于生态产品，村民就开始思考新项目，他们决定种植核桃。为此，还成立了专业合作社，核桃油已成为合作社的主打产品。

2017 年 3 月，由金河村村民充分讨论后自主发起的核桃油冷榨股份制项目也正式启动。在项目方的申请下，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对该项目进行了资金支持。

李玉坤一直担任河源村生态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同时也是河源股份制养蜂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坦言，合作社运行的效果并不理想，问题就是，大家总是站在 NGO 的角度做这个事，没有商业头脑，故事讲得再好，市场有自己的一套，比如供应量，由源头到销量的过程，农民完成不了，NGO 也完成不了，要有专业的商业团队来解决。“淘宝上人家的苹果既大个又光滑，而我们的苹果长得不大，卖相又不好，怎么卖？”

黎光村生态合作社理事长蜂金龙也一直愁着怎么把产品卖出去。他说，村里经济林果和药材的种植面积都不大，水质也不行，核桃每年产 10 多吨，要想规模化、集群化是不可能的。而养蜂，也不是每家每户都适合的，“要有那个基因”。

为了让生活在当地的老百姓从保护中受益，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也在市场对接上进行尝试。2015 年 10 月，他们联合项目服务区域的多家农民生态产业合作社，共同发起成立了以代销保护地农林产品为主的“大地有生联合社”。

但耿得安认为，即便对接上了市场，原生态产品要达到规模化生产也是个挑战。他说，因为不施农药、化肥，原生态产品受气候、水土的影响很大，要达到稳定的产量很困难，“比如蜂蜜，遇上雨水多，花粉就受影响，花蜜就达不到一定的产量”。

“尝试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到今天我们都不敢肯定。”邓仪说。在他看来，因为商业本身讲究“无奸不商”，要让老百姓既从商，又要不奸，这几乎只能是“半神半人”状态，因为面对金钱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谁也说不清。

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却对他说，联合社一定要商业化运作，要完全区别于公益机构的模式。刚开始，邓仪还有所抵触，可他转念一想，于建嵘说得很对啊。中

左页图：村民在林中采摘滇藏五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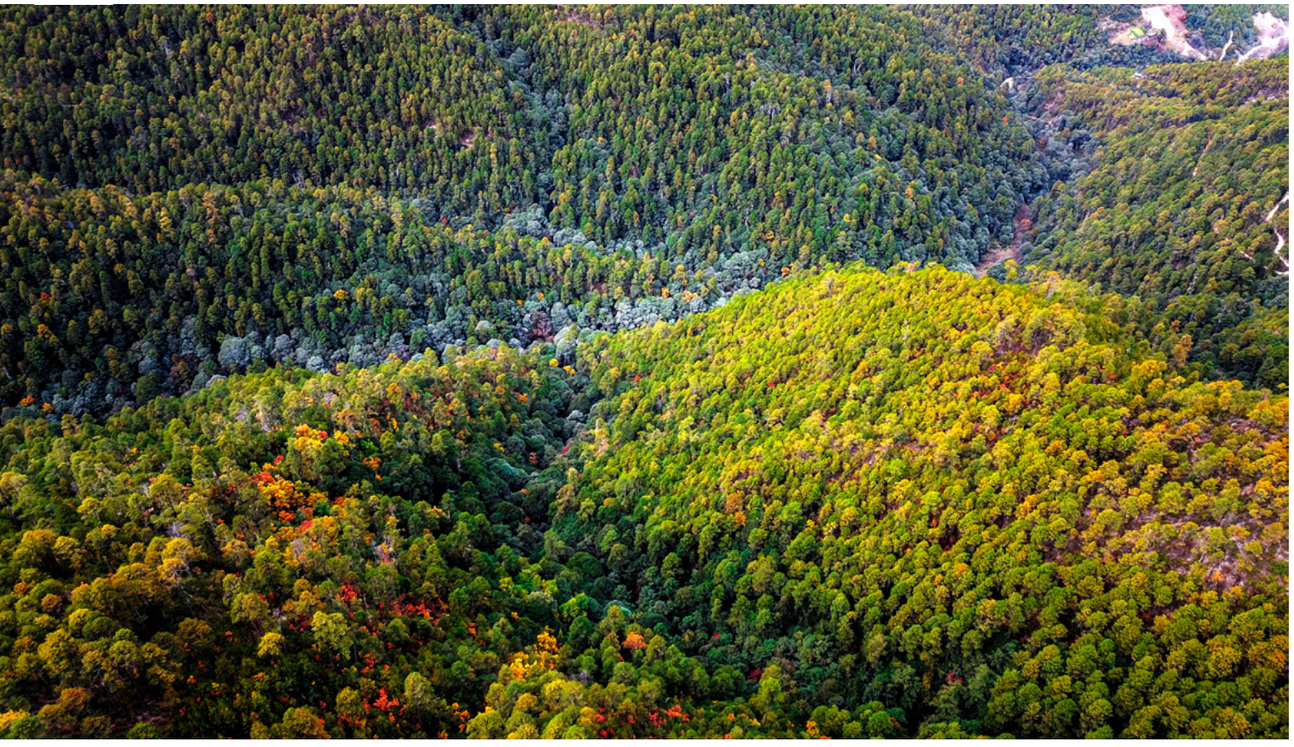
右页组图：村民们有着丰富的药材种植经验，依托良好的林下资源，他们开展了冬虫夏草、天麻、猪苓、附子、白芨等种植，并确立了药材仿野生种植股份制项目。他们期待，他们倾心种植的这些药材能“走出去”，被更多的人认识。

巴珠 一个藏族村庄的生态自觉

文/《中国周刊》记者 刘谟 摄影/《中国周刊》记者 杨剑坤
支持机构/香格里拉可持续社区学会

被莽莽森林环抱的巴珠村，
绿色的画卷扑面而来。

C



从云南迪庆州维西县塔城镇出发，沿着从原始森林中穿过的盘山公路向西蜿蜒而行，一边是高山，一边是小溪。一路上云南松、柏树、大叶杜鹃、小叶杜鹃、栗树杂相交错，在正午的暖阳下怡然挺立。这条曲径通幽的小路伸向巴珠村。

巴珠村是一个纯藏族居住的村寨，藏族人口占全村人口的 99% 左右，非藏族人口仅是几位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嫁入本村的纳西族妇女。

藏语“巴珠”的“巴”是四川巴塘之地，“珠”是逃亡、逃走之意。“巴珠”意即从四川巴塘逃来之人。传说八百多年前，四川巴塘有位藏族头人，带领 13 名童男和 13 名童女逃离巴塘，向东而行，来到现在的巴珠村所在地，看到这里山青水秀、风景如画，便决定在此定居。这是关于巴珠人祖先的最早传说。

到过巴珠村的人都会惊叹于巴珠茂密和广阔的森林。在巴珠村约 88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森林覆盖率竟达到惊人的 98.2%。

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中，偏居一隅的巴珠村，成为如世外桃源般的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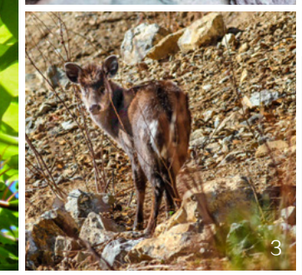
2002 年，香格里拉可持续社区学会（下简称香格里拉学会）会长刘蕴华在当地颇有名望的僧人南珠堪布的引荐下，到巴珠村考察。在巴珠村，她每天都能看到这样一个场景：清晨，村里的妇女代表都会背上背篓，轮流巡查数百亩山林，监督举报乱砍滥伐的行为，她们被亲切地称作“妇女巡山队”，而这全是由致力于生态保护的村民自发组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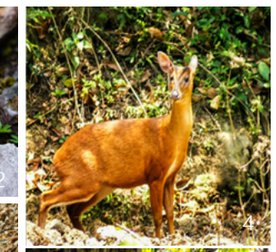
民间自发组成的环境保护做得如此之好，令刘蕴华深感意外。之后她为巴珠村的妇女巡山队申请到了 10500 元的补助款项，作为妇女巡山队的鼓励资金，并分别发给 21 个小组妇女巡山队以表示鼓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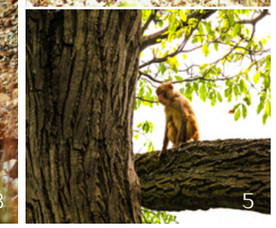
从那以后，香格里拉学会在巴珠村开始了持续性的服务。

传统的力量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作为云南省最大的林区，迪庆州的财政收入约 80% 来自于木材，不少群众也靠砍伐、加工和运输木料为生，原始森林遭到“掠夺式”采伐。过度的毁林开荒也加剧了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







组图：巴珠良好的森林生态环境成为各种野生动物的栖息庇护场所。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协助巴珠村民开展了野生动物的调查，记录了巴珠兽类多达二十多种。图 1：小熊猫；图 2：藏鼠兔；图 3：毛冠鹿；图 4：赤麂；图 5：猕猴。

而巴珠作为维西县塔城镇森林植被最好的地方之一，曾经也差点难以幸免。在巴珠村的一间小卖部，一位老人告诉我们说，当年塔城地区政府曾引进伐木企业要采伐巴珠所辖的很珍贵的原始森林，与村民协商，帮助巴珠修路，并给予经济和农业技术上的援助，被巴珠村民严词拒绝了。后来，伐木队曾试探性地进来采伐，巴珠村民集体抗议并表示如要强制采伐，将到州和省里反映情况。在村民的联合抵制下，伐木企业最终无功而返，巴珠的这一片森林得以保存。

在刘蕴华看来，巴珠森林得以很好保护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巴珠拥有良好的结合了传统宗教思想和现代管理方式的生态文化体系。

巴珠属于藏传佛教直贡噶举教派（白教）来远寺的属民范围，“藏传佛教讲求众生平等、杀生造孽等思想，对巴珠的影响很大，信仰的力量是能直接指导和限制现实生活中人的各项活动的，”刘蕴华说，“巴珠村民把花草树木都当成与人平等的生命，因此不能随意杀生、剥夺他们的生命”。

和藏区的其他村寨一样，巴珠同样有神山信仰。巴珠周围一共有 8 座神山，不同的神山有自己的性别和特点，在其中一座被村民们誉为“男神”的神山脚下，一位煨桑祭拜的村民解释说，不能在神山下大声说话，也不能在这里捡柴火，更不能砍树，就是已经枯死的树也不能带走，要不然会惹怒山神的。

浓厚的神山信仰观念深植于几乎所有巴珠人的内心，人们对此毫不怀疑。因此，在这样严厉的基于宗教信仰的自我控制下，巴珠村民自主的保护山神、保护生态，以获得山神的庇护。

在巴珠村，木瓜是村民家家种植的经济果木。因为木瓜易于管理而且长满刺，又不像乔木一样高大，种在地边的木瓜便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围栏，牲畜无法穿过。当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点以后，便主动在田边地埂种上木瓜。目前，巴珠全村已经全部形成了生态围栏，完全取代了过去依靠木板做的栅栏。

村民相对安全的生产生活方式，无形当中也成为巴珠森林得以很好保护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棵树的生命力有多大

刘蕴华认为，巴珠基于社区的自然保护已有了一些基础，但要达到自然资源高效的、可

组图：巴珠是藏族古典热巴舞的故乡，它产生于公元11世纪。今天，每到新年或是重大节日和宗教法会时，巴珠人仍会穿戴上传统的服饰和面具，舞起热巴。古老的藏族传统文化在巴珠得到很好的传承，藏绣、传统祭祀等，吸引了众多自然爱好者和生态旅游观光者的到来。

持续的管理，还需在社区个人和集体的层面系统地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并建立起一个更有效的长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机制。他们将包括8座神山、托克拉小组和说主角小组所管辖的林地划分为社区核心保护地，面积超过了9平方公里。

2013年，巴珠社区保护地被纳入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GEF SGP）项目。国际国内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管理技术和项目资金、设施设备的注入，把巴珠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推上了历史的新高。

在GEF SGP的支持下，香格里拉学会在巴珠建起了民间自然保护区。刘蕴华表示，“巴珠民间自然保护区”这一机制，以支持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的提升为己任，探索社区如何在有效的保护巴珠生物多样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民间文化传统的同时，帮助群众提高收入，改善生计，使之从生态保护中获益，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们想做的，比如经费支持他们购买太阳能设备、建沼气、种植中草药、发展林下资源、做藏文培训、做妇女健康培训。”刘蕴华说。他们还成立了专业的合作社，有药材、玫瑰、木瓜种植，木瓜卖到了四川、广东，玫瑰卖到昆明制成鲜花饼，村子里常有外地商人来收购药材、水果、菌类。

在巴珠村，最有人气的地方是由香格里拉学会与巴珠村共同建立的巴珠社区学习中心。这是一座两层藏式楼房，设有议事室、学习室、活动室等，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占地面积约1亩。社区学习中心的管理人员由社区村民自己选举产生，“能人带村”，对社区个人和集体的学习和能力建设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金玛茸是社区学习中心的骨干，村里大大小小的活动上都能见到他作为组织者的身影：香格里拉学会为药材基地和食用玫瑰基地免费安装太阳能杀虫灯，他为村民介绍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禁止滥采松脂的宣传活动上，他告诉村民，采割松脂会导致松树生长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会出现死亡。他慷慨陈词：一棵树的生命力有多大，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它？

香格里拉学会巴珠项目官员余建平见证了金玛茸的成长。他说，别看金玛茸现在出口成章，动不动就什么“小气候”“生境”这样的环保专业术语，他以前可是内向腼腆，跟人说话都脸红的。社区学习中心成立后，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培训，金玛茸的改变慢慢显现，自信心得到很大提升。余建平曾带着金玛茸和村里另外一个小伙子到广西参加“朴门永续设计”培训，这是一套起源于澳洲，让一切设计为地球生态可持续而服务的理论。一次，国家林业部门的领导到巴珠村考察，让余建平意想不到的是，大会上，在国家林业局的一位副处长讲到关于生态移民的话题时，金玛茸竟然自己走上台去插话，他反问那位副处长：如果生态移民，那让我们搬到哪儿？

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爱，超出任何外人

在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GEF SGP）项目资助下，香格里拉学会邀请专家对巴珠鸟类进行了本底调查，初步记录了巴珠村及周边3公里内鸟类已达205种，其中，包括一级保护鸟类4种，二级保护鸟类18种。

2015年，香格里拉学会请人来调查巴珠的森林资源，来做调查的人都是很懂植物的专家，他们一进来就感觉撞进了一块宝地，当然有的人就此打上了这片森林的主意。有一次，刘蕴华发现路边都插上了一个一个的牌子，上面都写着好几个与植物和中药有关系的大单位的名称，“他们把牌子插在那里，感觉好像是他们的地盘一样”。阳光下，这些牌子非常刺眼。刘蕴华当时就心想，可能坏了！她预感到接下来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果然没多久，就传出了有公司要在村里的某个地方建疗养院的消息。并且事情进展得很神速，没过多久，涉地村民的征地协议都签好了。

就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候，事情的转机出现了。一封巴珠村民的来信被递到州领导的办公桌上，信中，这位村民陈述了巴珠生态的重要性，表达了对外来商业行为进入后有可能对巴珠带来生态破坏的担忧。与此同时，国内某位著名的环保记者也关注到此事，并就此奋笔疾书。州领导意识到此

组图：古老的水磨坊经过维修，重新转了起来，村民们说，用它磨成的青稞面，比起使用现代化机器制作出来的，味道好多了。巴珠村民的收入主要靠生态种植和林下产业。白芸豆主要出口日本，重楼、食用玫瑰、木瓜等高山资源已变成“绿色银行”。铁丝网围起来的这片区域，是村里的松茸可持续发展示范基地，它为保护松茸生态环境，促进松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探索出一条现实的路径。

事有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立即叫停了这个项目。

刘蕴华说，巴珠村民对生态保护的重视，超出了她的想象，“村里的小伙子，他们没什么学历，但他们有非常丰富的知识，山上的一草一木、一鸟一兽，他们大多都认识，只是说有不同的命名方式。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爱，超出了任何外人。”

直到今天，村民们仍时不时地谈起这件事，对此事的思考也更加深刻和理性，“我们用行动阻止了外来的商业行为，但也有可能使巴珠失去了一次大的发展机遇。”金玛荣神情凝重地说。

让松茸每年都有得捡

在巴珠，松茸、羊肚菌等林下资源带来的收入，占到了村民收入的 30% 以上。松茸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开始走向市场，由于经济价值高，市场需求量大，开始出现不合理的采集行为，松茸的产量和质量均受影响，面临枯竭的危险。

为了让松茸资源可持续地采摘和利用，从 2013 年开始，香格里拉学会在石家本小组成立了松茸可持续示范管理基地，以期用永续发展的管理为整个巴珠村的松茸产业做一个前瞻性的示范。

在示范基地，阿支和阿布是村民选出的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每周，他们只进基地采一次松茸，这和基地外周边小组村民每周上山采挖 5 次相比，大大减少了采挖频率。两人将采下的松茸卖掉后，会把费用管理起来，作为基地的集体费用和小组的日常事务支出。他们还要对每周、每月、每年的松茸产量进行数据对比，以此得出合理采挖远比无序采挖更具有可持续性，同时在产量上也有胜出。

余建平介绍，建立松茸可持续示范基地的目的，一是为了尊重松茸的正常生长期，在捡松茸时，他们一般会将体型较小、正处成长期的松茸留下来，让它继续生长；另外，他们也想告诉村民合理采挖的重要性，“什么时候挖才是合理的品质，采挖的技巧是什么？比如不能用铁器挖，要用木质器具，挖后要恢复土质植被”。

松茸可持续示范基地得到了村民的支持和信赖，目前，已有 5 个小组以书面形式向香格里拉学会进行了申请。经过考察，托克拉小组即将建立村里的第二个松茸可持续示范基地。

两年下来，石家本小组获得了项目资助的管理补助共计 9000 元，令人感动的是，他们没有动用这笔资金，而是用这笔钱自发修建了一座桥。他们还在松茸生长区的外围修建了 3 个蹲守点，以此阻止那些无序上山捡松茸的人。材料费不够，村民们向村委会申请了部分，最后，搭亭子用的瓦还是不够，村委会主任自掏腰包 2850 元，对村民的自发保护工作进行了支持。

阿布说，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做这个事情的道理他明白。他说，他家的经济收入主要靠捡松茸和杂菌，只有一年一年把它们合理的保护好，每年自己有得捡，就是他最大的希望。中

在那野生熊猫蹒跚的地方

文 / 雪声　支持机构 /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四川平武县，素有“天下大熊猫第一县”之美誉，是著名风景区九寨、黄龙之门户。其中关坝沟东连唐家河国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大熊猫岷山中段大熊猫中心栖息地，属于重要的生态走廊带。

组图：在自然风光秀美的关坝村的河流中，石爬鮡被疯狂捕捞，为了保护该物种，平武县关坝沟流域自然保护小区恢复性发展冷水鱼产业，放养冷水鱼。

四川平武县，素有“天下大熊猫第一县”之美誉，其东邻青川县，南连北川县，西界松潘县，北靠甘肃省，是著名风景区九寨、黄龙之门户。据考察统计，这里拥有355只野生大熊猫，占全球总量的六分之一以上。

初冬时节，笔者来到平武县木皮乡关坝自然保护小区采访，想看看这里的金丝猴、大熊猫、扭角羚、红腹锦鸡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近几年来，由于当地干部群众的生态觉醒，在上级政府和一些环保公益组织的共同帮助下，曾经退化的生态环境逐步修复，一些珍稀动物又开始悠然自得出现。而尤其令人感到惊喜的是，这里的人们寻找到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子，摸索出了脱贫致富与共同富裕的经验。

原生态遭破坏 曾经令人痛心

关坝沟东连唐家河国级自然保护区，东南邻老河沟自然保护区，南邻余家山自然保护区，西面是小河沟自然保护区，位于大熊猫岷山中段大熊猫中心栖息地，属于重要的生态走廊带。根据全国大熊猫第四次调查分析，沟内大熊猫种群密度为0.06 ~ 0.2只每平方公里。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路过去，“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时而有“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雨里鸡鸣一两家，竹溪村路板桥斜”。那天，刚下过一阵雨，山色更显靓丽，似乎有画家又把这幅天然山水画刷新了一遍。然而，就在几年前，如此美丽的生态保护区域，居然面临山林植被退化、珍稀动物濒临绝迹的窘境。

关坝自然保护小区发起人，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简称“山水”）项目主任冯杰告诉笔者，保护前，这里面临盗猎、放牧、毒电鱼三大问题。他拿出一些照片，记录了曾经野生动物被剥皮后的惨状，皮剥掉、肉带走，

血淋淋的样子令人痛心。当时沟里有当地村民放养的500多只山羊，100多头牛，它们对植被的破坏，对环境的污染也很严重。这一带河流有一种价值昂贵、味道鲜美的石爬鮡（售价每0.5公斤近千元），于是一些人疯狂地毒鱼、电鱼、炸鱼、滥捕，导致该鱼种几乎绝迹。而且，当地和周边村民盗伐山林、采菌、挖药材也普遍存在，因此对大熊猫栖息地和生态环境造成几乎不可逆转的破坏。

关坝村因为有4个村民小组，121户，389人，所以虽处于几个保护区的核心区域，以前却没有正式列为自然保护区。而其实就地理位置来看，这片40.3平方公里面积区域，是重要的大熊猫栖息地和走廊。生态环境的恶化，同样威胁着当地居民的生存发展。

各方协同保护 关坝迎来生机

2009年，冯杰带领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社区保护团队进驻这里，他们和平武县各级干部一起，谋划生态恢复、经济发展思路。关坝自然保护小区尝试在不改变林地权属的情况下，整合关坝沟流域分散管理的森林资源，统一行使管理权、保护权及部分经营使用权，通过民政注册平武县关坝流域自然保护中心作为执行机构。林业局负责管理协调，乡政府以委托管理的方式，提供每年20000元管护资金，“平武县林业发展总公司”以共管的方式，提供每年30000元的管护资金，乡政府和林发司作为业主方提出要求并进行监管。关坝自然保护小区执法权委托乡政府对应的具有执法权力的机构和人员执行，由乡政府出面具体协调落实。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采用参与式方法，制定保护小区保护与发展规划，与县相关职能部门、林发司、乡政府、社区等共同建立愿景，识别问题，排序问题，提出解决措施，设定目标和制定行动计划，描述保护与发展策略和可持续资金筹措策略，制定管理有效性监测和评估的框架。

2010年，“平武生物多样性与水资源保护基金”开始支持关坝村探索生态与保护平衡发展之路。项目通过政府、水电企业以

组图：平武县关坝沟流域自然保护小区建立了森林监测巡护队，让村民学习使用红外线相机，积极引导村民发展养蜂、核桃、中草药产业。

及社会组织共同出资成立县级水基金，建立有偿生态系统服务的模式，基金初始规模为35万元。关坝村成为“水基金”第一批资助对象，开展生态养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2014年，关坝村纳入长江上游水源林地保护项目，成立社区保护发展基金，基金构成来源主要有：社会组织捐款、村级集体产业返利和高端市场生态公平产品利润反馈等。基金用于支持社区公共事务、社区保护以及村民产业发展需求和贫困救助等方面。

2015年9月，乡政府、村委和平武县林发司多次沟通，签订合作协议，并逐级申请，最终经四川省林业厅批准，成为省林业厅自然保护小区的试点，关坝村开始了以社区为主导的保护区外大熊猫栖息地管理的建设试点。

2016年初正式挂牌成立了平武县关坝沟流域自然保护小区，平武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邀请省林业厅、绵阳市林业局等相关单位共同见证保护小区的挂牌仪式，注册成立自然保护中心专门来做村子的保护，公开招募理事长、巡护队长，最终经现场民主选举产生。

村落里竖起了环保宣传墙绘、立墙，还建成了水磨坊、中草药基地。冯杰说，这些都是社区保护与发展基金成立后支持修建的，基金还连续三年购买石爬鮡和雅鱼鱼苗放流，目前群数量正在恢复，估计产值可达五六十万元；保护小区进一步规范森林监测巡护队的管理，开展例行巡护，自觉进行关坝沟内森林、动植物资源、水源的监测和保护。说起这几年巡护河流保护石爬鮡鱼的经历，保护小区理事长孟吉颇有感慨，缓缓道来保护行动中的一个事例。

2017年9月9日下午五时，他从村委会开完会回到家中，屁股还没坐热，一个电话打了过来。“快去河坝上看看，有人在钓鱼”。打电话的是村支书乔良，接到群众举报后立刻联系了孟吉。此时外面正此时外面正下着小雨，背上相机，打上伞，孟吉连衣服也来不及换就出门了。

到了举报地点，沿河堤小路迂回而下，果然看见一个中年男子和一个青年男子正在河边撒网。孟吉上前阻止，让他们把安置的网收起来，可这两人一点也不配合。

“你凭啥子管我们？”年轻男子质问道。

“我们是关坝沟流域自然保护小区的，这一段河流属于我们关坝村，里面的鱼是我们村子的共同财产，是我们保护起来的，你们不可以在这里钓鱼。”孟吉回应。

“警察都不管我们，你们有什么权利？”中年男子马上帮腔。

“警察要是来就把你们抓起来了，我们是没权力抓你们，但这段河在我们村范围内，我们有权力对这一段进行管理。”

“之前也有人来钓鱼都没人管，怎么就管我们。”两个人开始感到理亏，找别的借口。

“我们这条河已经保护了好几年了，一直都不允许私自捕捞的，别说你们，就是本村的也不允许。下次你们看到有人在我们这里钓鱼，也欢迎你们举报，我们还有200元的举报奖励。”

“行，今天你管吧，下次有本事你别过我们村的地界！”两个人有些恼羞成怒，竟然开始威胁。

“这个不存在的，我也是按规矩办事，咱们工作是工作，别伤了和气。改天你们过来耍，来我们家吃饭，我接待你。”孟吉笑着说，尽量减少现场浓烈的火药味。

或许是找不到什么借口，但又不想离开，两个人坐在石坎下躲着雨，一言不发。孟吉跟着坐了下来，开始给他们做思想工作。此时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天也慢慢地变黑了。

十多分钟后，两个人终于同意离开，但是收拾渔具的动作非常缓慢，显然是想拖延时间。孟吉见状，也来帮他们收网。

将这一片的网收完后，两个人开始往下游走，已经有了相关处理经验的孟吉紧随其后，到下游一看果然如他所料：他们是从下游顺着河道放网放过来的，虽然答应离开，但是却不把所有的网都收走，还有大量的网在这一片隐藏着。无奈孟吉只能自己收，走了两三百米又收了几十个渔网，其中一个里面还网着一只冷水鱼——石爬鮡。两人肯定是想等孟吉离开后再返回收网。

生态经济勃发 村民尝到甜头

在恢复性发展冷水鱼产业的同时，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还支持村委会积极引导村民发展养蜂、核桃、中草药产业、生态旅游。

其中，“藏乡土蜜”是“山水”引导下促成的自有蜂蜜品牌。李芯锐现在是“藏乡土蜜”养蜂合作社的领头人，谈起当年与养蜂结缘的经过，这个朴实的山里汉子滔滔不绝。

2011年底，李芯锐回家准备结婚事宜，打算结完婚继续外出打工。当时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村里经常借住李芯锐家里，他由此接触到了冯杰，被“发

组图：“藏乡土蜜”是“山水”引导下促成的自有蜂蜜品牌。目前关坝村已经建设了12个养蜂场，约1000群中蜂，蜂农平均年收入达到3000-4000元，大户一年收入可达4.5万元。

展生态养蜂、保护关坝环境”的构想所吸引。

“我个人一直有为家乡和家乡的环境保护贡献的想法，但以前一直觉得独木难支。”李芯锐看到村里成立养蜂合作社这样一个平台，很符合个人的理想追求，但当时缺少能干事的年轻人，于是就接过了合作社的担子，里里外外的开始奔波。

为了壮大规模发展会员，他深夜跟着老辈们去每一户会员的家里亲自检测蜂蜜的质量。时常被蛰的满身是包；为了合作社的“藏乡土蜜”商标的申请注册、包装设计，他跑遍工商、税务、质监部门，四下里找人协助帮忙；为了打开蜂蜜的销售渠道，他不仅要经营张罗合作社的淘宝店，还要四处奔波着参加各种市集和展销会……做了这么多，他几乎是又出钱又出力，但合作社因为处境困难只给过他800元的补贴。他自嘲说这几年好像一直在做吃力不讨好的事，但是为了建设环境友好产业的美好愿景，他一直在坚持，好在当下一切都走上了正轨，“藏香土蜜”甚至走进了五星级酒店餐厅。目前关坝村已经建设了12个养蜂场，约1000群中蜂，蜂农平均年收入达到3000至4000元，大户一年收入可达4.5万元。

除了“藏乡土蜜”，特色品种核桃产业也有起色。自2013年起“山水”支持关坝村乌仁核桃树母树调查并组织相关的核桃嫁接技术培训，通过与乡政府、林业局积极沟通，2015年，县农委为关坝村提供400亩核桃通防统治项目；2016年，在县林业局支持下，县扶贫移民局又下达64亩优良乌仁核桃品种苗圃基地项目。通过电商销售等途径，核桃产业已成为关坝村增收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

中草药产业发展情况又如何？村干部介绍，重楼是当地的特色中草药，由于关坝村耕地面积少，大规模产业发展并不现实。“山水”支持村委以“庭院经济”模式，鼓励村民以多产业小规模的方式发展，村委会向100户村民发放重楼树苗2300株，开展重楼栽培技术培训，有效减轻关坝沟内野生重楼过度采集的环境压力。现在，这里已建立了一级水源保护区，恢复大熊猫栖息地67亩。

由于村民转产转业，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关坝沟内养殖牛羊已从2009年100多头牛、500多只羊，减少到目前不足10头和100只。目前关坝村社区巡护队利用红外相机拍摄到了包括大熊猫、羚牛、黑熊、豹猫等明星物种在内的20种左右的物种。关坝村不但实现了绿水青山和清新清净田园风光的有效保护，还实现了脱贫致富、生活富裕、村风文明。今年10月举行全体村民大会决定，打算捞一部分石爬鲦卖掉，拿出收入的80%给全村人买新农合保险，剩下的20%用到村里的公共事业上。“只有让村民尝到保护环境带来的甜头，才能保证保护的可持续性，进一步激发他们保护的积极性。”村干部说。

取经纷至沓来 建设美丽中国

如今，关坝村名声日响，随着其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的提升。来自广西、云南、安徽、陕西、甘肃、四川的林业部门和NGO，桃花源和巧女基金会50余人到保护小区交流学习，成为四川省精准扶贫的极佳实践，为四川省自然保护小区管理办法和操作指南的拟定提供借鉴。

来自不同省份的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部门和机构到关坝保护小区交流学习保护小区建立和管理经验，并进行研究和传播。国内众多知名媒体，包括《中国新闻周刊》英文版、《四川日报》《人与生物圈》、国家林业局网站进行了报道，关坝自然保护小区的案例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并得到汇丰银行等企业的关注和支持。这些宣传效应同时带动当地的生态旅游。

关坝自然保护小区的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向前的实践，是政府、公益组织、群众一起参与的结果，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范例。其由败到兴的过程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在摸清家底前提下，需要制定规划目标；在整合资源同时，需要理顺管理体制；立足本土，壮大集体经济；社区为本，发挥村民主体作用；多元投入，实现保护与发展共赢。

这一实践也再次表明，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不矛盾，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把握好人与自然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推进绿色发展、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才能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旺盛活力，才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才能达到建设美丽中国之目标。中

三江源小村的“绿色生计”

文 / 杨悦笙 支持机构 / 玉树州金巴慈善救助会

竹杠晾晒牛粪可以将饪牛牛粪晾晒干后储存起来，替代木柴原料，作为日常生活的燃料使用。用牛粪作燃料除了经济实惠还能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现在已经成为当地人主要的燃料来源。

组图：尕麦村处于“三江源头”“中华水塔”的青海省玉树州中，澜沧江上游水系的河流覆盖了全县，在雪山草地、森林灌木间生活着雪豹、岩羊、藏雪鸡、猞猁等珍稀动物。

在文成公主走过的“唐蕃古道”上，在青藏高原腹地的藏族康巴文化核心区域，青海省玉树州这个被称为“三江源头”“中华水塔”的地方，有着一旦破坏便难以恢复的脆弱生态环境，因而其生态保护受到全世界的关注。玉树州囊谦县扼青海省南端，扎曲、孜曲、巴曲、热曲、吉曲等澜沧江上游水系的河流覆盖了全县，在雪山草地与森林灌木间，能看到牦牛、藏羊等牲畜行行列列，除了数百种高原野生植物，金钱豹、斑头雁等珍稀野生动物也栖息于此。

尕麦村是囊谦县一个小村庄，在这冰天雪地和绿水青山间生活的藏族居民，经济上皆是以传统的农牧业为生，尕麦村七成左右的土地被森林覆盖，而草场只有近两成，这使得畜牧的生产非常艰难，后来随着冬虫夏草等经济植物价格的攀升，一些农牧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但于整体而言生计的维持仍然十分艰辛，人们为扩大生产和满足生活的需要而大量砍伐森林以建造圈栏、房屋及烧火的情况就此开始出现。玉树州金巴慈善救助会会长扎西才仁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能依靠挖虫草谋生的农牧民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农牧民为了提高收入都会努力增加放牧等，由于野生动物基本栖息于森林中，现在大量的森林遭到破坏，产生的连锁效应就是野生动物生存受到威胁。”除了森林和野生动物，扎西次仁还注意到白色污染的破坏，他认为对当地而言，传统上防止白色污染的意识比较差，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工业日用品塑料包装很多，当地人不知道此类污染对人体的危害，那些垃圾经常被随地抛弃或直接采取焚烧处理，没有经过任何分类，这就很可能造成二次污染。

2013 年，扎西才仁和他的团队受到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GEF SGP）的资金及技术支持，在尕麦村开始了社区保护地项目的行动。项目针对具体的生态破坏现象，在当地人已经开始自发地巡山清除野生动物捕猎网、清理白色垃圾等环保行动基础上，通过整合社区人力资源，以传统知识、文化结合现代科学环保方法，对社区生物多样性资源分布、种类，以及神山圣湖的现状及面临的威胁和问题等开展全面性的调查，成立社区保护地，并实施系列环保活动，以期在生态和人文环境得到系统保护的基础上

组图：2013 年，在全球环境基金（GEF）的支持下，尕麦村开始了社区保护地项目，为了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小组的成员们学习、使用各种设备，在雪地间穿梭。

改善当地人的生活。“之所以选择尕麦村，是当地作为三江源保护区内的一个小社区具有代表性——自然环境、资源得天独厚，同时又面临环境不断遭到破坏的生态危机。”扎西才仁说。

项目组在尕麦村社区建立了当地年轻人组成的二十余人团队，经过来自 GEF SGP 的专业培训成立社区生物多样性巡护和监测小组，每个人配备相机、GPS 和红外相机设配等，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下开展了数次生物多样性调查，收集 10 余种物种信息，当地生物种类数据库初步建立，并制作了尕麦社区《神山圣湖及生物多样性图册》，在建立起社区保护地时，还制定出保护地内神山、圣湖、森林、草地及野生动植物的管理办法，社区保护地得到有效管理并再次制作完成一本关于《神山圣湖及生物多样性及旅游路线图册》。管理办法与图册可以保证做到保护生态的同时，宣传尕麦社区，带来更多的游客，增加旅游收入。

除了调查生物多样性，队员们还开展环保知识宣教等系列保护活动，以白色污染防治工作为例，扎西才仁说：“造成白色污染的垃圾是用化工科学的方法生产的，所以处理的时候一定也要用科学的方法处理，当地社区传统上会将塑料袋、电池等垃圾集中焚烧，对当地的空气环境造成污染，对人体健康危害很大。”基于此，项目组在宣传白色污染等生态保护常识方面下了很大一番功夫，同时尽量将当地的垃圾搬运到县城集中处理，这些行动在当地很快产生积极的效果，分散的垃圾焚烧行为已经杜绝，垃圾分类收集、集中处理的体系已基本建立。

牛粪是青藏高原农牧民普遍使用的燃料。然而在尕麦村社区，由于雨水多、地形陡峭导致牛粪不易干，潮湿的牛粪又容易滋生菌虫，将之燃烧又与当地人忌杀生的习俗相违，所以在 70% 森林面积，20% 草甸覆盖，林木草场资源丰富的尕麦村，当地牧民从 20 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大量砍伐森林，就地取材，搭牛棚、建房子，更多地是用木材来做燃料。如今，当地人依然习惯于砍伐柏木来获取生活燃料，二三十头牦牛拉着成捆的木材一度蔚然成景。但是，玉树州大部分地区由于高寒缺氧，森林资源极为稀少，只有在囊谦等少数地区分布有限的天然林资源，这种天然的柏树林在高原极为稀有，尕麦村群众砍伐柏木当柴，对当地柏树林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的威胁，且伐木工作通常均由女性完成，当地木材在砍伐过程中会产生有害气体，对女性的健康非常不利。经过项目组研究，他们发明了竹杠晾晒牛粪的方法，可以更快、更好地将牦牛牛粪晾晒干后储存起来，作为日常生活的燃料使用。用牛粪作燃料除了经济实惠还能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现在已经成为当地人主要的燃料来源，森林砍伐有了明显减少。据统计，80% 的社区牧民不合理采伐柏木的

组图：为了保护当地的柏木森林资源，社区项目组研究发明了竹杠晾晒牛粪的方法，可以更快、更好的将牦牛牛粪晾晒干后储存起来。为实现“绿色生计”，当地还开展了生态旅游文化节。

行为得到有效管理，1000 株柏木的资源得到可持续的保护。

项目团队刚开始开展调研工作的时候，有些社区居民还产生了误会，认为项目组开展调研是要开采矿产，随着一项项具体工作地落实，社区保护地项目受到当地居民发自内心的欢迎。扎西次仁提到一个曾经长期盗猎野生动物的当地居民，通过参与项目，了解生态保护的利益，于是主动向扎西次仁表示从此不再猎杀野生动物。其实，项目的实施也在文化层面上契合了当地人的传统美德，受藏传佛教文化影响的当地人，传统上对自然充满敬畏，在地方性知识中有大量朴实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尕麦村每年有三次大的宗教节日，主要的内容就是敬山神，人们会通过宗教仪式感恩大地赐予的物产资源，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对自然的攫取、破坏表示忏悔。当地虽然有很多矿产资源，如果大规模开采可以快速致富，但是居民们没有那样做，他们的态度是把资源留给下一代，避免涸泽而渔。”扎西才仁认为藏族传统文化并不导向征服自然，慈悲、寡欲等藏族文化中的传统美德对促使当地人积极参与社区保护地项目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当地人有保护环境的积极性，但缺乏环境保护和个人保健的常识，项目组也利用日常的传统节日，在当地人集会时适时宣讲科普生态保护的知识，通过宣传画册、文艺表演和《难以忽视的真相》的环保影视作品的发放，对比环保、健康生活方式和不良生活方式，号召居民坚持传统的、更加天然、环保的生活方式。

负责尕麦村社区保护地项目的玉树金巴慈善救助会成立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每次做事情都是三方合作的，首先我们会依照政府的政策规划，然后了解当地人的实际需求，然后再去实地调查。”不过，他们目前也面临很多问题，扎西才仁说，一个是团队的人员比较少，那些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就留不住，原因是无法提供好的薪资待遇；第二个是平时开展项目的资金比较少；第三个是专业化程度不高，比如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工作需要专业的人员，但目前的团队很缺乏专业知识和技术。“未来我们还准备做一些健康卫生方面的宣传教育，主要是面向人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常识，就这方面做那方面的宣传教育，以及相关环保公益活动。”

目前，项目团队已制定出“社区可持续发展规划”，至少 30 名农牧民接受了“社区自然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友好型生计发展”相关培训，15 名妇女也进行了社区可持续生计发展的学习，未来计划在尕麦村开展手工艺作坊等生计发展项目。项目组也完成对 5 户家庭的生态旅游接待培训，尕麦村作为囊谦县新开发的旅游路线，将开始为游客提供牧民生活文化展示的旅游接待。“最大的一个愿景就是根据当地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然后开发一些旅游项目，为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奠定基础，通过生态旅游的运作带动当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和居民生活的改善”说起未来的规划，扎西才仁话语里中总是充满自信。中

在历史与现代之间的社区保护地和世界遗产

翻译 / 王炙鹿、刘怡 摄影 /Grazia Borrini Feyerabend
支持机构 /ICCA Consortium（国际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联盟）、
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

意大利安佩佐多洛米蒂自然公园，多洛米蒂是意大利古老的社区保护地，它的历史和治理类型有着独特的一面。

一汽-大众 Audi

安佩佐山谷社区被意大利认可为一个私人的法人实体，它的使命和活动包括普遍的利益和关切。

国际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联盟（ICCA Consortium）是一个全球的“运动组织”，通过促进社会变革来增强保护中的公平。它与原住民和当地社区合作，确保他们自己的保护地得到恰当的认可和支持。这些保护地被称为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ICCA）。

国际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联盟于2010年正式成立，它源于早先的一些运动、网络和合作，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且有影响力的网络，并且为其不同的成员所重视。它在世界各地拥有越来越多的合作者和伙伴。如，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GEF SGP）都是国际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联盟在推动和支持ICCA中长期、重要的合作伙伴。目前，国际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联盟正与GEF SGP合作实施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全球支持倡议（ICCA Global Support Initiative），对相关国家的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政策、法律进行梳理，支持区域间的交流和能力建设，以及通过GEF SGP在地方层面直接支持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的活动。

社区管理的世界自然遗产地

尽管地域相对狭小，意大利却是拥有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在它的44个世界遗产中有42个是因其特别的文化价值而被列入，只有两个是因其独特的自然价值而入选的。即使这两个，也不能避免一些独特的社会文化特征。多洛米蒂就是意大利古老的社区保护地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安佩佐多洛米蒂（Dolomitid'Ampezzo）作为区域自然公园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它大部分杰出的自然特色和景观毗邻着科尔蒂纳丹佩佐村（Cortina d’Ampezzo）。虽然这个保护区的地位和管理方法与许多其它的保护区相同，但它的历史和治理类型却有着独特的一面。

多洛米蒂自然公园大多数处于保护状态，它的土地属于一个古老的农业社区，这里近一千年来都是社区不可分割的领地。

奥迪 A8L 典藏版限量升级，为尊荣专属而生
尊贵再进化

这个社区从地区当局那里获得了全面且直接负责保护区监管、技术和财务决策的权力，甚至为此区域和国家保护区法律进行了一些修改。因此，这些法律的一些具体条款明确地预见了今天将保护区的管理委托给集体私营实体的可能性。尽管在其他地方，保护的状态被视为强加的和被积极反抗的对象（当不被公然动摇的时候），在安佩佐山谷，人人渴望、赞赏保护，并希望对保护有所贡献。一个生动的例子是，社区乐于将从土地持有中获得的全部好处，重新投资于保护区的管理——这是不容忽视的。

安佩佐山谷社区被意大利认可为一个私人的法人实体，它的使命和活动包括普遍的利益和关切。这个实体是一个古老且非常活跃的机构，被称为“安佩佐山谷的规则”（Regoled'Ampezzo），一个由11个小村庄组成的联盟，在大约一千年的时间内拥有和共享不可分割的社区财产——这片拥有丰富森林和牧场的土地。“Regole”（“规则”）既是一种管理土地的具体方式，也是一种农村文明形式。它在现代化过程中存留了下来，坚持到今天，与富翁们的别墅和精英旅游形式并存着。

多洛米蒂山脉是意大利最著名的景观之一。人类在那里居住了几个世纪，在保护环境和人类发展活动之间达成一个平衡。这种平衡是由“Regole”提供的。“Regole”这一机构塑造和维持了我们现今所看到的当地环境。由于幸运的活动和公民保护与争取领地完整的能力，“Regole”成功地将自然遗产的管理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Regole”是阿尔卑斯山区一种典型的社区机构。过去有几千个这样的机构存在，尽管由于社会文化的广泛变化，有时它们会遭受某种方式的“攻击”，但是许多社区机构现在依然在运作。这个机构是相当民主的：所有有关自然环境和保护区的决策，都由聚集了所有成员家庭的代表组成的大会决定的。木材采集和对旅游活动的小心管理使社区获得了可观的收入，这些收入完全重新投入到领地和保护区的保护当中。但是“Regole”并不仅仅投资金钱。他们投入劳力，知识和技能以及他们自己的机构和能力来建立和执行合适的规则。在很多方面，社区明白如果“Regole”的领地和保护区受到威胁，社区自己的身份就会受到威胁……我们很难想象出还有比这样更密切的关系和更多价值的“社会财富”形式。

自然区域公园是意大利的重要领土，如今也被列为世界遗产地。法律承认“Regole”是自然区域公园的管理主体，这是“Regole”几个世纪以来对领地的适当管理留下的印记。目前保护区的地位正好突出强调了两方共存的生物多样性的益处——一方是令人铭记的壮丽的山区生态系统，另一方是一个组织良好、纪律严明且充分认识到自身权利和责任的社区。

从更细节的角度看到，“Regole”设法确保了他们大部分的关键需求。他们获得了对土地和自然资源权利的正式承认，也作为ICCA的管理机构得到尊重。他们得到了保护，免受外界的侵犯，并实施“发展”倡议和支持以应对ICCA在保护上的挑战。此外，他们积极与意大利的类似机构建立联系，保持政治警觉且不把现在的状况当作理所当然。

但是从法律和经济的角度来看，即使情况完全令人满意，一些关键的挑战依然存在。对于“Regole”总体——特别是“Regole”作为ICCA的管理主体来说——主要的挑战是向年轻一代传递领地文化以及对将社区长期利益置于个人短期利益之上和之前这一理念的尊重。除了金钱无处不在的主导价值，个人的成功和直接的利益，“Regole”必须吸引和激励青年人，丰富他们的身份认同，并唤醒他们属于这一特殊土地“社区”的自豪感。

原住民自发保护自己的家园

科伦岛（菲律宾巴拉望）的塔班瓦人（Tagbanwa people of Coron）居住在一个美丽的石灰岩岛上，并制定了严格的森林资源使用规定。岛内12个淡水湖除了两个淡水湖之外都是圣湖，且只限于当地成员进入（通常用于宗教和文化目的，或为了获得鸟巢——一种当地年轻人向中国商人出售的珍贵资源）。外来者可以直接进入Kayangan湖和Barracuda湖，并只能在规定的时间游览，而且夜间不允许逗留。塔班瓦的青年们都很好地组织起来，维持当地的清洁，要求游客遵守有关行为、噪音、垃圾等方面的规定。旅游收入则被用来支持当地人的教育和医疗支出。

几年之前，当地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那时候塔班瓦人对他们领地的权利没有得到法律承认，这个岛被旅游经营者、外来渔民、政客和寻求土地交易的政府机构所侵占。这造成了严重的问题，从海洋资源

一汽-大众 Audi

奥迪 A8L 典藏版限量升级，为尊荣专属而生
尊贵再进化

组图：当地的老人和青年维持着同他们的岛屿之间的联接，青年将有能力和智慧来应对文化同质化的威胁，保持他们与美妙的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之间联系的独特纽带。

的匮乏到传统权力的蒙羞。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菲律宾非政府组织 PAFID 的帮助下，塔班瓦人自发组织了科伦岛塔班瓦人基金会 (Tagbanwa Foundation of Coron Island)，申请了社区森林保护协议。1990 年，保护协议授予当地人对科伦岛 7748 公顷的土地以及邻近的 Delian 岛的权利，但并没有包括海域。1998 年，岛上居民设法获得了覆盖 22284 公顷土地和海域的“宣告祖居领地证书”(Certificate of Ancestral Domain Claim)。2001 年，在高清地图和“祖居土地管理计划”的帮助下，他们获得了“祖居领地权利证书”(Certificate of Ancestral Domain Title)，被赋予了这两个岛屿和周围水域的集体权利。

从那以后，塔班瓦人就准备好保卫自己的岛屿，执行有关旅游准入的规定，并从中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利益。但问题仍然存在，特别是在行使第二个岛（Delian）及其祖传水域的权利方面。尽管塔班瓦基金会一再要求，但没有政府部门的合作，暴力的外来渔民也无法被驱逐出去。塔班瓦人社区也不得不面对内部的冲突（金钱相关）以及在贫困社群内尚未解决的许多问题。他们每天都在为供水、卫生、健康与教育服务和交通运输而挣扎。幸运的是，大多数人——包括老人和青年，仍然维持着同他们的岛屿之间的联接，以及他们共同的身份认同感。比如，社群不愿批评或羞辱任何人，这在决策过程中造成了一些停滞，但也可能有助于社群更长远的生存。最近，塔班瓦人建设了一个小型遗产中心，他们收集了有关他们抗争的资料，并阐述了他们准备继续掌控祖居领地的意愿。充满希望的是，当地青年将有能力和智慧来应对文化同质化的威胁，保持他们与美妙的 ICCA 之间联系的独特纽带。

在宗教和传统知识下传承的保护地

门兹的瓜沙地区（Guassa of Menz）坐落在埃塞俄比亚的中部高地。在过去的 400 年中一直保持目前相对原始的状态。瓜沙地区的自然资源管理系统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鉴于其持续时间之长，它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古老的保护区之一。这个地区作为社区的资源而保留，用途包括：收获“瓜沙草”

一汽-大众 Audi

奥迪 A8L 典藏版限量升级，为尊荣专属而生
尊贵再进化

组图：瓜沙地区，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古老的保护区之一。习惯法、复杂的宗教仪式、有象征意义的活动等等，原住民社区已经发展出了非常适应当地环境的生活方式。

做茅屋顶、家用和农用，比如用来牧养牲畜和割灌木作薪柴。其实，这些资源严格限定在一定的时期内，由有限数量的用户使用。使用瓜沙地区资源的权利取决于普遍的土地权属制度——“Astmeirist”，一个基于祖先血统和埃塞俄比亚科普特正教会建立的制度。

像其他任何本土自然资源管理制度一样，瓜沙的保护有管理制度并通过一个机构执行。门兹人建立了一个本土机构，被称为“Qero 制度”，以对自然资源进行保护和平等分配。在“Qero 制度”下，这个地区使用自然资源的社区民主选举一名长者作为首领，称作“Abba Qera”。“Abba Qera”负责保护和管理瓜沙地区自然资源的使用。

1974 年，一场全民的起义和革命席卷了全国。1975 年 3 月 4 日，新革命政府宣布了全部农村土地的国有化。在埃塞俄比亚的大部分地区，佃户与地主之间的关系被废除。公告废除了土地私有和社区土地所有权，赋予了所有农民在国有制框架内使用土地的权利。革命同时建立了农民协会以分配和规范土地的使用。结果，“Qero 制度”被废除，连同其对自然资源管理的机制。这些变化也使那些早先被排除在资源使用之外的人不受控制地进入瓜沙地区。

社区制度的优势之一就是它所具备的韧性——应对变化的能力。当“Qero 制度”被废除时，社区适应了新政权设定的条件。他们把事情交给新的地方政府，并通过 8 个农民协会组建了一个新的“瓜沙保护委员会”。在某种程度上，这取代了以前的社区首领“Abba Qera”。它的目的是监督农民协会的活动以保护瓜沙。瓜沙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执行协定的规章，特别是在关闭期间监管瓜沙地区的非法使用。这项制度由社区选出的社区侦察员执行。非法使用资源者将在当地法院受到起诉，屡次违法者则被带到区（Woreda）法院。

最重要的是，瓜沙委员会决定有必要制定一个在地方政府层面得到认可的管理计划。实际上，这意味着将这个地区归类为社区保护地——这在埃塞俄比亚还是第一个。这一归类将确保传统形式的土地使用和当地社区的生计。最近，一份管理计划草案得到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审查。预计这个管理计划将得到地方保护部门批准，从而使社区获得瓜沙地区的所有权证书。

通过管理对这个地区的开发，古代的制度也保护了这里独特而多样的动植物。瓜沙地区拥有许多与非洲高山生态系统特有的动植物物种。例如，该地区有 22 种哺乳动物，其中 27% 是埃塞俄比亚特有的。

这包括世界上最濒危的犬科动物——埃塞俄比亚狼（Canissimensis）。这一物种在全世界范围内约有 530 只，门兹瓜沙保护着该国保护区系统之外，埃塞俄比亚狼最主要的栖息地之一。这一地区的其他重要物种包括地方特有的狮尾狒（Theropithecus gelada）。因为它是曾经广泛分布的狮尾狒属（Theropithecus）中唯一幸存的成员。这些拥有狮子般的鬃毛，通过翻唇行为显示威胁的神奇动物是世界上唯一以草为食的灵长类动物。它们聚集成多达 400 只的巨大群落。他们也应该得到瓜沙地区给予的保护。鸟类也因“Qero 制度”而受益，在这一地区有记录的鸟类有 111 种，而其中 12 种是埃塞俄比亚当地特有种。瓜沙地区鸟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有很多猛禽，它们和狼一样，把丰富的啮齿类动物作为食物。

雨水落在瓜沙地区，开始漫长的旅程，从青尼罗河最终到达地中海。事实上，有 26 条河流、泉水和溪流起源于这一地区。当地社区保护植被而提供的生态服务，对于所有的下游水资源使用者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

总的来说，原住民社区已经发展出了非常适应当地环境的生活方式。他们与自己领地的长期关联产生了与土地之间强烈的纽带关系，具体表现在习惯法、复杂的宗教仪式、有象征意义的活动以及对他们的资源非常详实的了解上。这样的了解被深深烙印在传统知识中，代代相传，并加以改善。与环境的长期联系及长期留在当地的保证，使原住民社区能够审慎地管理自然资源——即使按照现在的标准。

一个真正的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

塞内加尔卡萨芒斯地区的 Mangagoulack 农村社区是一个相对偏远的地方，居民几乎全是 Djola 人。它还处在“发展”的边缘，2009 年的时候这里还没有柏油路，许多家庭也得不

一汽-大众 Audi

奥迪 A8L 典藏版限量升级，为尊荣专属而生
尊贵再进化

组图：塞内加尔卡萨芒斯地区，是还处在“发展”的边缘的一个相对偏远的农村社区。

到电力供应，但当地却因为丰富的本土文化而显得生机勃勃。Djola 人非常重视家庭、亲缘和社区关系。他们是一个主张人人平等且相当民主的社会，他们没有“首领”，由村民大会做决策，妇女们很受尊重，在社区也很有影响力。人们坚定地信仰某个宗教，比如伊斯兰教或基督教，但每个人都使传统仪式和做法保持着活力。比如，社区的成年礼，农活里的合作，对乡土特产的依恋，每个人都尊重无所不在的、象征着有形和无形世界之间纽带的复杂认知的信仰。

近年来，由于外来者不分青红皂白地捕捞和资源开采使得沿海环境恶化，渔获越来越少。因此，来自农村社区 8 个村庄的渔民决定建立一个协会。这个协会刚开始只是积极参与红树林种植和其他一些地方性的小项目，但几年之后，他们有了更大的雄心，成立了一个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正是在那个时候，GEF SGP 及时提供了一揽子的支持计划，让他们知道可以做些什么，并且一起计划成立一个 ICCA。这个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被他们称作 Kawawana——这是 Djola 语里“我们都希望保护祖先的遗产”的首字母缩写。

建立一个真正的基层的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在塞内加尔尚属全新的经历。这个国家有许多自称“基于社区”的倡议，却是由民间组织（NGO）构思和实施的，并由政府任命的官员“管理”。在 Mangagoulack，情况则不同，渔民协会决定尝试利用“国家分权法”，这个法赋予了农村自治区管理自然资源的责任。GEF SGP 为社区的会议提供资金，并通过一个小型跨学科专家团队为他们提供技术咨询。在这个团队的帮助下，渔民协会重新审视并发掘了当地的传统做法，包括一些“危险精灵”居住的“圣地”，在那里捕鱼是被禁止的。根据这一发现和其他分析结果，协会帮助其制定了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的基本分区和管理计划。这个计划包括一个禁止进入的地区（这是“危险精灵”常住的地方，渔民希望资源可以恢复），还有一个只有当地居民可以捕鱼或者采集的地区（只供本地消费和本地市场）。他们也规划了第三片区域，在这里国家规章制度将被严格执行，机动船只被禁止进入。该协会还为新的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设计了一个全面的治理架构，并结合了传统元素。比如，由受尊敬的老年妇女借助已有的信仰举行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的勘界仪式；一个由“智者”组成的议事会来帮助解决冲突；尽可能地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来做决定。也包括现代国家的要素，比如，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获得了农村自治区议会、地区议会和卡萨芒斯地区区长的正式批准，他们与国家渔业局密切合作，对保护地实施了划界。最后，他们制定了一个监测计划，随着时间跟踪他们的工作成果。

经过多番努力，地区议会和卡萨芒斯地区区长正式批准了社区成立 Kawawana 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它现在是塞内加尔的一个样板，同时也是 KABEKA 协会的创始之一，这个协会将推动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在塞内加尔全国得到认可。中